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一本 第三分

(抽印本)

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
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
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

A British Museu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acau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atural History
Information Network Flows among
Britain, India, and China

戴麗娟

Li-Chuan Tai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91, Part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0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一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九年九月

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 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 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

戴麗娟*

十九世紀初旅居廣州、澳門的英人社群曾在澳門設置一個小型博物館，這個存在僅五年、久遭遺忘的博物館晚近在國際學界受到注意，但現有研究並未充分說明此博物館為何會在該時機點出現在該地，也未說明此博物館的基本特徵和意義。憑藉當時報刊文章、日記、遊記、書信中的零星資料，本文嘗試建立該博物館的基本人事時地物資訊，並進一步探索此個案所透露的歷史意義。

由於孟加拉亞洲學會及其附屬博物館是這個澳門博物館推動者的主要參照對象，當時正逐漸形成的亞洲學會網絡因此是幫助我們瞭解此博物館的第一層脈絡。又由於博物館展品有許多屬於自然史類標本，當時英、印、中之間所形成的自然史資訊與物質的流通網絡遂為本文所強調的第二層脈絡。尤其是以加爾各答植物園為中心所構成的植物與種子交換網絡，亦可見到與澳門博物館有關的人員之參與。藉由梳理廣、澳與當時加爾各答、倫敦在自然史方面的往來關係，本文還原了澳門博物館在一個全球性流通網絡的重要節點地位。

再以歷史縱深來看，澳門英人社群雖因規模過小而在當時無法成立一個亞洲學會，但其經驗多少促成後來移居香港、上海的英、美人社群的相關組織，本文結論部分因此連帶說明此澳門博物館的歷史遺緒。

關鍵詞：澳門英人社群 澳門不列顛博物館 亞洲學會 加爾各答植物園 自然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十九世紀英人社群在澳門的科學文化活動遺緒」(MOST103-2410-H-001-035-MY2) 之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的支持。後續相關調查工作也得到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的獎助，計畫編號 AS-CDA-105-H01，筆者在此向獎助單位謹表謝忱。

今人熟知的博物館形式在中國最早究竟於何時出現？隨著論者定義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答案。然若論博物館學在中國的最早發展，則較無爭議地可回溯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國博物館協會之成立。當時包括丁文江、任鴻雋、向達、傅斯年、徐悲鴻等人在內的六十八位發起人，意識到博物館對於推動現代科學、教育、提升社會文化的重要性，訂下「以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並謀博物館之互助」的協會宗旨。¹ 也是在這樣的推動意識下，該協會對於當時中國境內的博物館做了一番普查，以發送表格填寫的方式，收集了當時寄回表格的博物館之基本組織資訊和館藏特色，分類並陳，出版《中國博物館一覽》，嘗試反映此界概況。² 正是在此普查之後，當時博物館界人士建立初步共識，普遍認定中國博物館之設置，始於一八六八年法國人韓伯祿 (Pierre Marie Heude, 1836-1902) 在上海所創立之徐家匯博物院，其次為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所創之上海博物院，時間是一八七四年。³ 其後尚有一八八七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懷恩光 (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 在山東青州設立的博物堂，也屬於有全國知名度的早期博物館。⁴ 但由於這些皆為外國人之設置，有論者遂認為，若以中國人自辦之博物館的標準來看，清末實業家張謇於一九〇五年在其故鄉所設之南通博物苑才算是中國第一所博物館。這樣的史觀在一九八〇年代新的中國博物館學會成立後被普遍推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之類的紀念活動會在二〇〇五年舉行，因其依據正是以南通博物苑為中國第一所博物館算起。⁵ 在這樣的史觀作用下，此前外人在中國設置的博物館，即使曾有頗輝煌的作為，也因此

¹ 〈組織中國博物館協會緣起〉，《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北平) 1.1 (1935): 2。

² 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博物館一覽》(北平：中國博物館協會事務所，1936)。

³ 有關此二博館的發展細節，請見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館到震旦博物館——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3 (2013): 329-385；戴麗娟，〈展示自然：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動 (1874-1952)〉，《法國漢學》18 (2019): 72-116。

⁴ 懷恩光後於一九〇四年在濟南設立廣智院，此院成為山東博物館前身之一。民國時期對此博物館的觀察，可見：黃炎培，〈山東廣智院 (考察教育所見之二)〉，《教育研究》(上海) 19 (1915): 7-16；梁容若，〈濟南廣智院調查記〉，《山東民眾教育月刊》3.3 (1932): 71-85。

⁵ 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被打入歷史冷宮，逐漸遭人遺忘。相較於既有史論，葡萄牙學者蒲加 (Rogério Miguel Puga) 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一份以「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為標題的英文文章指出，一八二九年英人在澳門設立的一個小型博物館，由於比徐家匯博物院更早出現，才應該算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⁶ 若此說成立，則博物館在中國出現的歷史又可往前推進約四十年，值得研究者關注。可惜此文雖提出新說，但對於此博物館之成立背景及其實際內容卻少有說明，文中篇幅多在描述當時參與此博物館活動的英籍人士所寄回英國的標本對於增進當地自然史認識的貢獻。由於學界對此澳門博物館所知甚少，為彌補此一空白，並進一步釐清此博物館之成立背景及性質，筆者因此著手調查。

雖然這個僅存五年的博物館所留下的直接史料極少，但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這個博物館初創時的參照對象，並非英國本地的博物館，而是位於印度加爾各答、成立於一八一四年的亞洲學會附設博物館。若論及自然史標本的流通與寄送，對於當時身處澳門和廣州、且會將收集品捐贈給這個澳門博物館的業餘自然史愛好者而言，其對話對象除了倫敦皇家植物園（簡稱邱園）之外，其實也包括加爾各答植物園。因此，若只是強調這個博物館為中國第一個博物館，或是強調英人將標本寄回母國的貢獻，我們可能無法理解為何在這個時期的澳門會出現這樣的設置，也可能會錯失此個案涉及的種種面向所反映的歷史意義。為了說明這些前人研究所忽略的面向，本文分兩部分陳述：第一部分嘗試重建此博物館的基本資訊與相關人物，第二部分說明當時在澳門的這些英籍自然史愛好者與加爾各答往來的主要組織，亦即亞洲學會及其附屬博物館，還有加爾各答植物園。後者與澳門博物館之間表面上並無直接往來關係，但若仔細觀察當時曾寄送植物到加爾各答植物園的澳門英人名單，會發現幾位與此博物館有關的英人也在其中，因此本文將以部分篇幅說明當時在廣澳、加爾各答兩地的英人社群在植物資訊方面所建立的來往管道。最後在結論部分，也將說明這個僅存五年的澳門博物館在香港和上海之遺緒。

⁶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3/4 (2012): 575-586. 此文在腳註所提供的參考資料有不少錯誤，讀者需自行查對。

壹·澳門不列顛博物館初探

(一) 澳門英人社群的形成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珠江入海口以西，面積雖小，卻是大航海時代開啟後，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上一個較早被標示的地方，因為在中國明朝的海禁政策下，澳門是唯一合法的中外貿易城市。⁷ 一五五七年，海外勢力強大的葡萄牙人在明朝同意下獲得定居許可，並積極建城與經營港口，以葡華合力的方式擊退海盜，成為中國東南沿海防禦的一環。取得明朝信任後的葡人將澳門變成其在遠東的國際貿易商埠，從中累積許多財富，澳門因此也成為荷蘭、英國等其他歐洲新興殖民帝國覬覦之地。十七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幾度嘗試占領澳門作為對華貿易港口，但都不得其門而入，直到清乾隆年間（1736-1796），政府調整其對外貿易政策，葡澳當局亦訂定外國人居澳政策，葡人之外的外國商號才得以長期駐澳。一六八四至一七五七年間施行的四口通商政策，⁸ 以及後來的廣州一口及公行制度，都使得廣州成為中國最大口岸，而澳門則成為其外港。大約在一七六五年前後，澳門作為西洋人在貿易季外的居住地已成為常態。⁹ 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量遽增，遂於一七七三年在澳門設立正式據點。有了據點後，澳門確實成為該公司在廣州以外最重要的貿易中心。此外，清廷自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實施所謂的「防範外夷五事」，嚴格規定在廣州貿易的外商在貿易季（隨季風與洋流而定，大致是每年十月到翌年三月之間）之外不得逗留於該地，於廣州居住期間亦不得攜帶女眷等，¹⁰ 澳門因此逐漸成為該公司職員在貿易季之外（即每年四月到九月間）的居留地。且由於女眷不得進入廣州，所以澳門也成了英國商人帶到亞洲的家屬之長期居住地。隨著長居久安後，富裕的英人社群在澳門逐漸成為葡人之外最重要的西人社群。

⁷ 澳門史的基本參考書籍眾多，若是選擇以地圖看澳門近代史，可參考：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香港：三聯書店，2012）。

⁸ 四口即廣州、泉州、寧波、松江，一七五七年清廷關閉了其他三口，僅留廣州一口。見前引書：薛鳳旋，《澳門五百年》，頁 52。

⁹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

¹⁰ 相關規定細節可參考：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8 冊，卷六〇二，頁 760-761。

即使如此，這個社群的人數並不算多。若根據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 在其名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中提供的統計數字，以公司因失去壟斷權而撤離廣州的一八三四年往前推十年為一個區段來看，英籍人士大約在 41 到 66 人之間。其中大部分是東印度公司職員，餘則為散商。這個數字並未統計女眷，以及一些從鄰近英屬殖民地搬遷到澳門居住、但不以經商為業的英籍人士，例如身後留下多幅澳門市街風景以及人物肖像畫的知名畫家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便是從印度遷居到澳門、並且老死於當地的一個例子。由此可推估，在澳英人社群最多時可能有百人，但因為是以公司職員為主體，每年貿易季到來時，固定會有二十多人到三十人必須移居廣州商館，貿易季過後才又回流到澳門，所以固定留在澳門的社群規模並不大。另外，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到澳門巡察時曾做過統計，當時澳門英國人有 57 戶，¹¹ 可見此社群雖是葡人以外最大的西洋人社群，但其規模比起在印度的英人社群來說，實在是非常小。

儘管如此，從十八世紀末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英人將商貿重心轉至香港和上海之前，這些英僑在澳門其實曾發展出一些重要的科學、文化、休閒活動，此一現象在以往以中、葡為主的澳門研究中較少被關注，但晚近已有較多研究。目前這些研究多集中在新教傳教、英華字典編纂、印刷事業的推進、早期新聞報刊之發行、西式醫療活動之引入等，¹² 其他部分仍少有觸及。本文主題，亦即英人在一八二九年所設立的小型博物館，便屬於仍有待深入調查的個案。

(二) 澳門不列顛博物館最早蹤跡

過去有關澳門史的基本參考書大多沒有提到這個存在僅五年左右的博物館，¹³ 僅瑞典史家龍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1759-1835) 在同時代出版的澳門史中曾簡

¹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 196。

¹² 例如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譚樹林，《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

¹³ 例如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短提及。¹⁴ 在目前少數提及此博物館的著作中，也有認為那可能只是一個未實現的計畫。¹⁵ 由於這個博物館並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設置，公司本身的廣州與澳門檔案資料也找不到相關記載。¹⁶ 在直接史料極少、前人研究亦稀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利用可能收集到的各種零星資料來重建。根據目前所得的資料，最早提到這個博物館成立情況的是《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 刊登於一八二九年三月二日頭版的一篇文章。¹⁷ 在此之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本身出版的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 在一八二九年下半年期也提及此博物館，並引用上述《廣州記事報》文章的部分內容。¹⁸ 另外一份一八三一年才出現的英文雜誌《廣州雜誌》(*The Canton Miscellany*) 在該年五月號介紹澳門概況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扼要地提到這個在兩年前設立的博物館。¹⁹

《廣州記事報》報導的方式是先全文刊登一份宣傳單 (prospectus)，之後才略加說明最新情況。報導開場先說明一個「在華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 in China) 即將設立，下接的宣傳單起頭則說：「有人提議在廣州或澳門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持一個『自然史和藝術奇珍品陳列室』的設置，希望願意共襄盛舉的人

¹⁴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Boston: J. Munroe, 1836), p. 30.

¹⁵ 少數提及此博物館的書籍有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見該書頁 92 之簡短描述。這位作者把此博物館歸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設置，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另有提及此博物館、卻認為是個未實現的計畫，例如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2-23.

¹⁶ 筆者在大英圖書館查閱紙本檔案以及檢索晚近由 Adam Matthew 公司完成的相關資料庫，皆未查到關於澳門博物館的直接資訊。見 Adam Matthew, Marlbrough, East India Company (<http://www.eastindiacompany.amdigital.co.uk>，讀取 2019.01.30)。

¹⁷ “British Museum in China,” *The Canton Register* 1829.03.02. 該報全名為《廣州記事報和行情報》，由英國商人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1796-1878) 於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創辦。

¹⁸ “Museum at Macao,”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 28 (1829): 370. 此刊物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本身出版的刊物，報導英屬印度各地的情況與人事動態，有時亦包含從非洲到亞洲地區與東印度公司業務有關的各地新聞。

¹⁹ “Actual State of Macao,” *The Canton Miscellany* 5 (1831): 381. 這份刊物為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在澳門出版，由馬禮遜主導，以文史內容為主，僅在一八三一年出版五期，大部分文章皆未署名。

士都能署名。」(It is proposed to form a Societ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in Canton or Macao “a Cabinet of Natural History and Curiosities in Art.” Those who are disposed to associate in this intention are requested to annex their Signatures.) 根據報導，這份宣傳單一開始是先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職員間流傳，得到多數人支持後，才在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一草創會議，會中決定博物館將設在澳門，由英人社群內報名者出資支持。其他國家人士也可申請加入成為榮譽會員或通訊會員，只要通過會員投票表決的方式即可。報導並稱當時新成立的博物館已收到不少藏品，包括一位美國紳士的慷慨捐贈。報導中還提到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博士會將宣傳單翻譯成中文，散發給廣州的行商與到廣州洽公的內地商人，希望中外人士能共襄盛舉，將相關收藏品捐贈給該博物館。

至於博物館成立的目的，根據宣傳單的說明，是為了收集中國及鄰近地區的自然史標本與工藝珍品，好讓大家多瞭解當時還鮮為人知的中國及附近島嶼的自然史。尤其是在中國尚未對外全面開放時，藉由展示各地的動植物標本，可讓中國人瞭解外國人對於自然史研究的興趣及用心，包括收藏、分類及完整的保存方式，期許能有更多來自中國人的協助，包括標本之蒐集及相關研究。宣傳單結尾則列出這個陳列室期望能收到的各項藏品，包括各類動物、植物的乾燥標本或相關圖畫、礦物標本、中國藝術類的標本（例如各類服飾）、手工藝品、各類器械模型、各類農漁、水利、冶鐵器具、各類神像、樂器、錢幣、自然史書籍與圖版等。

值得注意的是，宣傳單提到在澳門當地成立博物館會遭遇到的困難之一是環境條件不佳（意指過於潮濕），可能會有生物標本保存不易等問題，但撰稿人認為，當時已有的化學配方可以克服這個問題，而且還認為，若位於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能夠在更惡劣的環境下維持多年，澳門的博物館應該也可以。

《廣州記事報》這份報導雖無作者署名，但應該是出自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當時亦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的馬禮遜之筆，因為馬禮遜從《廣州記事報》一八二七年底創刊開始，即擔任該報主要撰稿人。²⁰ 而且從一八二八年二月後，因原編輯伍德 (William W. Wood, 1804-?) 離職，他還擔任編輯一段時間，因此該

²⁰ 見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vol. 2, pp. 383-384。

戴麗娟

報有關廣州當地和中國的新聞多出自他的筆下。²¹ 此外，馬禮遜在一封日期為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信中，也向當時已返英定居的前上司兼好友小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提到這個博物館，並說明這個博物館的參與人並不限於商館職員，而且其實一些商館職員已經婉拒加入。馬禮遜信中提到已確定的三位執事人員名字，還說年費是三十元。並說因為取名不易，參與眾人決定暫時用「在華不列顛博物館」這個名稱。由這些資訊可知馬禮遜不僅十分清楚博物館初創一事，還可能是主要推動者和參與者。²² 馬禮遜的遺孀艾思莊 (Eliza Armstrong Morrison) 為他出版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該年夏天在澳門成立了這個博物館，馬禮遜熱心地推廣，還在本地人當中散發傳單，陳明博物館的宗旨，尤其是馬禮遜也打算在推廣學習中文的場合裡，鼓勵學生透過物件來瞭解中國歷史、宗教倫理觀、法律和習俗等等。²³

從這些歷史資料來看，這個博物館的推動者原先是想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持博物館的運行，但是學會未見成立，倒是博物館先設置，而且很快地收到不少藏品捐贈。不過這個博物館的運行方式本身像是學會模式，不僅有會員制，而且需要繳交年費，新會員的加入則需要通過會員大會表決。由於廣澳的英人社群人數一直不多，要支持一個學會的活動的確會有困難，小規模的博物館則只要有藏品，很快就可運作，加上參與者固定繳交年費，或足以支持博物館經營所需費用。

若追溯馬禮遜曾促成辦理的博物館，其實澳門這個博物館並非第一個，因為早在麻六甲英華書院於一八二〇年竣工時，學校即在一樓附設一個小型博物館，也是接受各方捐贈藏品。²⁴ 一八二三年，萊佛士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²¹ 該報第一任編輯為美國人伍德，但他在一八二八年二月因與出資者馬地臣意見分歧而離開，編輯改由馬地臣和馬禮遜擔任，直到一八三〇年。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第一卷，第二章，頁 273。該章節係由寧樹藩撰寫。此細節因未有其他文獻佐證，真實性還待確認。筆者感謝蘇精教授的提醒。

²² 見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424。馬禮遜與小斯當東為廣州商館的同事，小斯當東返英後，商館的翻譯工作遂多由馬禮遜承擔。有關小斯當東的研究不少，中文部分可先參考：游博清、黃一農，〈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 (1793-18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9 (2010)：1-40。其著名的回憶錄晚近亦有中譯本：斯當東著，屈文生譯，《小斯當東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²³ 見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p. 427-428。

²⁴ Robert Morrison,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3), p. 22;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

打算在新加坡成立一個類似英華書院的學校，馬禮遜赴新面商，由於當時馬禮遜所倚重的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已過世，馬禮遜曾經考慮將麻六甲的英華書院遷移至新加坡，與規劃中的新學校合併。雖然後來這個名稱為 Singapore Institution 的學校並未成功推行，但在規劃時也包含一個附屬博物館。²⁵ 此外，在短暫回英期間，馬禮遜與友好人士在一八二五年中也促成一個讓有心赴異國傳教者可以學習中文等東方語言的語言傳習所 (The Language Institution)，馬禮遜遺孀在其回憶錄寫到，馬禮遜「讓該機構使用他自己有關中國的藏書和藏品」(Dr. Morrison granted the society the use of his Chinese Library and Museum)，並親自教授中文課程，以鼓勵學生的學習。²⁶ 可見他平日也有收藏中國文物或相關標本的習慣，透過物件增加對異文化的瞭解，對他來說並非陌生之事。由此種種跡象來看，馬禮遜若非澳門這個小型博物館的主要推手，起碼也是重要支持者。

(三) 博物館所在地點

至於這個澳門博物館所在的地點，《廣州記事報》報導中並未提及，前述於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專題文章中也沒有任何說明，因此我們只能從其他資料推敲。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的主要據點有二處，一處是位於現今白鴿巢花園旁的花園洋房及附近數公頃範圍，該洋房原為葡萄牙富商裴瑞拉 (Manuel Pereira) 在一七七九年建成的別墅，建成不久即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承租，作為該公司的大班寓所及高級職員宿舍。²⁷ 英國使節團訪華經過澳門時也是下榻於此。²⁸ 洋房旁有一花園，公司大班在此栽種了許多由東南亞船運而至的樹木花卉，或是由歐洲運來試栽的植物。該公司另一處據點，是在風順堂街的風順堂（即聖勞倫佐教堂，為澳門最古老的三座教堂之一）正對面的一幢俗稱「十六柱」的兩層樓華廈

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60, 72.

²⁵ R. L. O'Sullivan,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the Early 'Singapore I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2 (1988): 45-62; Paul Ku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 1818-1843: Its Location and Faciliti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1.1 (2018): 69-88.

²⁶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300.

²⁷ 見吳志良等，《澳門編年史》第3卷，頁1096。該洋房所在地今日為東方基金會現址。

²⁸ 譚樹林，《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頁331-332。

戴麗娟

以及鄰近地帶，此處乃一七七二年七月向澳門富商高士德 (António José da Costa) 承租，作為澳門分公司的辦公處所。²⁹ 東印度公司於一八三四年結束澳門業務後，該處被賣給澳門天主教會的義大利神父，開設無原罪工藝學校，後改為慈幼中學。據稱在此華廈以東，一直到南灣沿岸的區域，有一大片以花崗岩高牆包圍的長矩形區塊，內有英式花園及許多小洋房，分配做辦公室、醫院及職員宿舍。根據澳門耆宿金豐居士的一篇文章，這個與東印度公司有關的博物館位置是在今學校巷南端西側的一塊空地。此地就在風順堂區東印度公司職員辦公、活動的區域內，離南灣不遠。在東印度公司解散後，原址交給澳門天主教區使用，並在二十世紀初時，由加爾各答寶血女隱修院使用。³⁰

(四) 博物館陳列內容

但這個博物館當時究竟是獨立的館舍，或是和其他文化設施（例如商館在一八〇六年所設的小型圖書室）共用一個建築物？博物館有何陳列品？由於該博物館並非東印度公司主動設立，所以在商館的檔案中並無相關記錄，但曾經參與或參觀過該博物館的人留下的零星記錄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在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資料中，有三條是同時代的人參觀博物館的見證，一條是支持博物館活動的人所留下的資料。這些資料一方面證明這個博物館並非一個未實現的計畫，而是確實存在且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提供零星訊息，讓我們得知該博物館當時的陳列內容。

²⁹ 見吳志良等，《澳門編年史》第3卷，頁1065。「十六柱」的由來是由於華廈正門兩旁各有四對孖柱，合計十六條柱，故當地人皆稱之為「十六柱」，見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1993），頁30。關於「十六柱」之確切地點，晚近遭到質疑，但新說是否正確，還有待考證，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上卷，頁563。

³⁰ 金豐居士，〈寶血修院鳳尾坡吉穴難得清貴〉，《新報》2008.05.15。筆者於此特別感謝澳門中央圖書館羅偉成 (Luis Lopes) 先生所提供的這條難得的資料。金豐居士並非學界中人，但他對澳門早期發展的風水掌故之考證，常可提供歷史學者在圖書館無法覓得的線索，見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偉傑的相關評述：何偉傑，〈作為史料的專欄文字：以金豐居士所撰的風水掌故為例〉，《澳門歷史研究》9 (2010)：205-207。此外，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著的《澳門編年史》中也多處引用金豐居士所撰的報刊文章，可見當地治史者並不排除這類風水掌故文章的可信度。

第一條見證是美國麻州薩林 (Salem) 羅氏家族 (Low Family) 的一位年輕女士羅哈蕊 (Harriett Low, 1809-1877) 所留下的記載。³¹ 美國人在一七八四年初抵廣州，雖比歐洲幾個主要國家晚，但到十九世紀初已經存在幾家規模可與英國散商競爭的美國公司，例如著名的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即是一例。羅哈蕊的父親 (Seth Low, 1782-1853) 與叔父 (William Henry Low, 1795-1834) 合力經營廣州與北美之間的進出口貿易。³² 一八二八年，其叔父成為旗昌洋行的經營夥伴，並被派到廣州工作。當時剛滿十九歲的羅哈蕊被邀請來陪伴其體弱無子的孀孀 (Abigail Knapp Low)，而於一八二九到一八三三年間在澳門定居。³³ 這段期間，在家裡十一名子女中排行老二的羅哈蕊以寫信給家鄉大姊 (Mary Ann Low) 的形式留下頗詳細的生活日記，另外也寫了不少信給在美國的其他家人。一九四三年，她的日記與其他書信被後代捐贈給美國國會圖書館。³⁴ 在此之前，其女兒 (Katharine Hillard) 與孫女 (Elma Loines) 曾動手整理並出版部分內容，³⁵ 但遲至二〇〇二年這份日記才有完整的打字校註版問世。³⁶ 現在這批資料已被視為是瞭解十九世紀初澳門洋人社群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可彌補官方記錄或東印度公司檔案所不及處。³⁷ 由於博物館的主要參與者瓦契爾 (George Harvey Vachell, 1799-1839) 曾經企圖追求羅哈蕊，羅因此在日記中經常提到瓦契爾，偶爾也會提及博

³¹ 這位女士在當時並沒有自取的中文名，此處中文譯名乃參考蘇精教授的翻譯：蘇精，〈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西醫來華〉，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69。

³² 有關此家族背景細節，可見 Elma Loines, ed., *The China Trade Post-Bag of the Seth Low Family of Salem and New York, 1829-1873* (Manchester, ME: Falmouth Publishing House, 1953).

³³ 她們兩位被認為是首批到中國定居的美國籍女性。見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 vol. 1, p. 2.

³⁴ 有關這批資料的史料價值，當時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 (Arthur W. Hummel) 有專文介紹：Arthur W. Hummel, "The Journal of Harriet Low,"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tions* 2.3/4 (1945): 45-60.

³⁵ Katharine Hillard, ed., *My Mother's Journal: A Young Lady's Diary of Five Years Spent in Manila, Macao,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from 1829-1834* (Boston: George H. Ellis, 1900); Loines, *The China Trade Post-Bag of the Seth Low Family of Salem and New York, 1829-1873*.

³⁶ 即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³⁷ 不少依據此資料做成的研究陸續出版，例如 Rosmarie Wank-Nolasco Lamas, *Everything in Style: Harriett Low's Maca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一書。

戴麗娟

物館的情況。例如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記錄中，她提到她贈送一塊鳳梨纖維製成的布料給來訪的郭雷樞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1797-1879)，當時在公司廣州商館擔任助理醫生的郭雷樞當下即說應該把如此特殊的布料捐贈給博物館，並註明是由羅小姐捐贈。³⁸ 可見當時博物館初立，鼓吹各界捐贈藏品，故當地英美人士言談之間會提及此種可能性。另外她在一八三一年七月五日的記錄中也提到曾隨馬禮遜博士、葡商裴瑞拉 (Antonio Pereira) 和英商福克斯 (Thomas Fox) 等人到瓦契爾處欣賞剛從爪哇寄來的幾種鳥類，是準備放在博物館的標本。該次讓她印象深刻的還有一隻狐蝠 (flying fox) 和一隻吸血蝙蝠 (vampire bat)。³⁹ 此外，在一八三二年二月一日的記錄中，她提到和叔父等人去參觀這個博物館，並說此博物館成立時間雖不長，但已經擁有許多罕見的展品，特別提到其中有人類骨架的展示等等。⁴⁰

日記中提及、但今已不多見的鳳梨纖維布料究竟是什麼樣的布料？為何郭雷樞認為是可以捐贈給博物館的藏品？根據晚近一份研究，運用鳳梨纖維製成布料的記錄早在西班牙人到達南美洲與加勒比海群島之前就已在當地出現，但一八四〇年代才在歐洲開始流行的鳳梨纖維布料則多是從亞洲進口。由於其布質輕盈透亮、價格又比絲便宜，曾一度與絲織品混用，甚至被當作婚紗用料。一八五一年在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有從菲律賓與中國進口的鳳梨纖維織成的手帕商業樣本，以及從雅加達、新加坡、印度馬德拉斯等地引進的鳳梨纖維和布料展示品。⁴¹ 羅哈蕊在一八二〇年代末的澳門可取得這樣新奇的布料，可能是當時常居亞洲的西洋人社群之間開始流傳的新材質，因此郭雷樞才會認為該放在博物館展示。

有關這個博物館的第二條見證是在越南出使中國的燕行使者李文馥 (Lý Văn Phức, 1785-c. 1849) 筆下找到。⁴² 李文馥乃移居越南的華人後代，三十四歲開始仕宦，在一八三〇到一八四二年間有多達十一次的出國訪問記錄，足跡遍及菲律

³⁸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92.

³⁹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241.

⁴⁰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287.

⁴¹ Edwina Ehrman, ed., *Fashioned from Nature* (London: V&A Publishing, 2018), pp. 71-72.

⁴² 筆者於此特別感謝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陳正宏教授提醒我留意這位越南名儒的遊歷詩文集。

賓、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澳門，也曾到過孟加拉和印度加爾各答，被認為是越南阮朝最著名的外交官之一。⁴³ 他與其他幾位越南使節兼文學家一樣，習慣以詩文記錄海外旅途見聞，並以此呈報國王。⁴⁴ 他於一八三三年因護送海上迷途的廣東水師梁國棟之戰船回國而經過澳門，⁴⁵ 留下詩文數首，其中一首題為〈登洋人博物樓〉，正與此澳門博物館有關。詩中言：「卻怪心思巧，能令耳目憐，骨枯人挺立，翼斃鳥飛旋，風物重樓上，煙波八月天，紛陳奇崛意，欲問更誰傳。」而注文則寫道：「西洋人最機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骨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⁴⁶ 可見當時博物館展品為數不少，且已有剝製立起、栩栩如生的動物標本，也有整副站立的人骨。後面這條記錄正好與羅哈蕊的見證不謀而合。由此詩文亦可推知展示室是在一建築物上層，需登樓而至。

第三條見證是來自英國探險家兼自然史學家貝內特 (George Bennett, 1804-1893) 的記載。此人於一八二八年取得外科醫師證照，在一八三二到一八三四年間展開太平洋地區的長途旅行，對自然標本等特有興趣。後來與英國知名自然史學者如歐文 (Sir Richard Owen, 1804-1892)、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等人都有書信往來。他在長途旅行回程後出版了《新南威爾士、巴達維亞、佩地爾海岸、新加坡和中國漫遊記》(*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Batavia, Pedir Coast, Singapore, and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in Those Countries, During 1832, 1833, and 1834*)，記錄他在太平洋各國間旅行見聞，吸引不少讀者。在這份遊記一八三四年的部分，他曾提到澳門博物館即將關閉的情形：

澳門的英國居民成立了一個博物館，館內廣收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稀物品，諸如飛禽走獸、武器化石等。幾間陳列室專用於展示館藏，並配置一名專人管理藏品與協助參觀者。

⁴³ 陳益源，〈在閩南與越南之間——以越南使節李文馥家族為例〉，《應華學報》17 (2016)：1-16。

⁴⁴ 莊秋君，〈十九世紀越南華裔使節對中國的書寫——以越南燕行錄為主要考察對象〉，《漢學研究集刊》20 (2015)：113-136。

⁴⁵ 陳益源，〈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陳益源著，張伯偉主編，《越南漢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25-236。

⁴⁶ 李文馥，〈登洋人博物樓〉，《粵行吟草》(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 13 冊)，頁 74。

然而當地對自然科學的鼓勵是如此薄弱，而歐洲商人們又是如此投入於營利事業，以致於當東印度公司解散後，這一批來源極廣、又具價值、且在科學方面有益的出色藏品勢必會被分散而流落四方。⁴⁷

從他的見證可知，這個所謂的博物館是由幾個陳列室構成，其中展品頗豐，不僅有動物標本，也有化石和武器等等，並且有一名管理人員在現場看守。這點與前述的宣傳單所說明的規劃相符。不過貝內特認為當地以商貿為重的歐洲居民不夠關心這類事物，所以在東印度公司撤離澳門後，這些收藏可能將無法被繼續完整保存，而遭分散各處。

另一條有關博物館存在的資料則是在倫敦邱園的檔案中找到，來自於當時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擔任貨監的米利特 (Charles Millett, 1792-1873) 與當時還是格列斯哥大學植物學教授的胡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785-1865) 之間的一封信，日期是一八三〇年四月十三日。米利特在信中感謝胡克寄給他的兩份圖版，並說一份將交給李富士 (John Reeves, 1774-1856) 先生，另一份將存放在「我們澳門博物館的圖書室」 (in the library of our Macao Museum)。⁴⁸ 米利特的父親已經是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他本人約在一八一〇年到達廣州商館，從基層書記開始做起，後曾因病回英短期休養，一八一八年升為貨監，到了一八二六年更晉升為特選委員會的一員，一八三四年隨著廣州商館結束而返英。⁴⁹ 他在華期間

⁴⁷ George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Batavia, Pedir Coast, Singapore, and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in Those Countries, During 1832, 1833, and 1834* (London: R. Bentley, 1834), vol. 2, pp. 35-36. 原文如下：A museum has been established at Macao, by the English residents, and even now contains an extensive and excellent collection of birds, beasts, weapons, fossils, &c.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Several rooms are appropriated solely for this collection, having a person to take charge of them, and attend upon visitors. So little encouragement, however, is given to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European merchants are so much absorbed in mercantile affairs, that, 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this excellent nucleus for an extensive, valuable, and (with scientific arrangement,) useful collection, will no doubt be broken up and dispersed.

⁴⁸ Letter from Charles Millett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3 Apr 1830,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52/20.

⁴⁹ 游博清，〈《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786-1816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臺北：元華文創，2017），頁 57, 72；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376.

曾經從馬禮遜學習中文，公餘也四處收集植物，在這個領域裡的主要聯繫對象便是胡克。⁵⁰

綜合這些涵蓋了一八二九到一八三四年的零星線索可知，當時這個博物館應是在一棟建築的樓上，占有數個陳列室，面積也許不大，但是藏品豐富，不乏奇珍異物，而且來源不止中國物產。博物館不只有陳列室，也附有小型圖書室。這樣的設施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通常被稱為 *cabinet of curiosities*，正如前述《廣州記事報》所刊載的宣傳單一開頭所言明的。但相關設施後來皆習慣被稱為 *museum*，尤其是帶有公開、公益性質的建設更是如此。十九世紀初，所謂的 *museum* 之實際運作情況仍與 *cabinet of curiosities* 大同小異，與今日我們所習見的，同時具有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功能的現代博物館仍有一大段距離。⁵¹ 故此處不宜因為有 *museum* 一字就以現代博物館相比擬，而必須視其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奇珍陳列室。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草創時參與眾人決定暫時使用 *British Museum in China* 這個名稱，但實際運作後，參與者多直接以 *Macao Museum* 來稱呼這個博物館，如我們在上述米利特信函中所見。

（五）博物館經營人員

由於此博物館並非由東印度公司本身直接主導發起，所以也不是所有公司成員都參與，但上述馬禮遜信中所提到的三人，⁵² 包括擔任此博物館管理人 (*curator*) 的瓦契爾、擔任秘書的小李富士 (*John Russell Reeves, 1804-1877*)，以及擔任會計的克拉克 (*Henry Matthew Clarke*)，其身分的確都是該公司職員。以下便分別說明這三人的背景。

第一位是擔任管理人的瓦契爾，他出生於英國劍橋郡 (*Cambridgeshire*) 的一個牧師家庭，在一八二一年獲得劍橋大學的學士，一八二八年受聘擔任東印度公

⁵⁰ Emil V.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 1898; reprint,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td.; Tokyo: Edition Synapse, 2002), vol. 1, pp. 298-301.

⁵¹ 現今普遍認知的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四大功能實際上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博物館學的專業化和所謂的「新博物館」(*New museum*) 運動才形成的，見 Hugh H. Genoways and Mary Anne Andrei, eds., *Museum Origins*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2008).

⁵²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424.

司的牧師 (chaplain)，於八月十五日抵達中國。有關瓦契爾在中國所收集的標本細項，知名的俄國漢學家貝勒 (Emil V. Bretschneider, 1833-1901) 在其名著、也是這類主題的基本參考書《歐人對中國植物的發現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中已經有基本描述，此處便不再贅述。⁵³ 瓦契爾大多數時間都在澳門服務，僅於貿易季時隨公司職員到廣州工作。他於一八三二年十月回英國結婚，一八三四年再度到中國，所以實際協助博物館事務應該只有不到四年時間。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處於一八三四年解散後，瓦契爾曾在廣州為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 工作一段時間，後於一八三九年病逝。

在華期間，瓦契爾除了牧師的工作外，非常熱衷於收集動植物標本，並且與表弟、同時也是達爾文的好友傑尼斯 (Rev. Leonard Jenyns, 1800-1893) 有密切書信往來。⁵⁴ 他曾將中國的花卉及果實製作成標本冊，送給傑尼斯及劍橋的植物園。⁵⁵ 這段期間，傑尼斯參與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韓斯洛 (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曾經是達爾文的老師) 和地質學教授賽傑威克 (Adam Sedgwick, 1785-1873) 在一八一九年所發起的劍橋哲學會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這個學會為劍橋大學的自然科學發展注入新的力量，⁵⁶ 瓦契爾也算間接參與其中。他曾將在澳門及鄰近小島收集的植物標本寄給韓斯洛，也曾經寄給劍橋哲學會許多標本，包含了乾燥植物、描繪蜥蜴的繪畫、昆蟲、鳥類皮毛、蝙蝠、地質學樣本、貝殼、荔枝、燕窩、中國人的頭骨等。他所收集的植物標本後來大多存於劍橋大學植物園及邱園。⁵⁷ 他在中國發現許多新的植物種類，有助於歐洲人更深入認識中國植物，因此有幾種植物是以他命名，例如金合歡中的 *Vachellia Wight & Arn.* 即是一例。

在植物之外，瓦契爾也收集魚類標本。他曾將約一百件魚類標本獻給劍橋哲學會，其中約有八十種是來自澳門的魚類。這批收藏並成為李查森 (John

⁵³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p. 294-298.

⁵⁴ 李麗青，〈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澳門研究》4 (2015)：160-166。

⁵⁵ Lamas, *Everything in Style*, p. 308.

⁵⁶ 有關當時英國科學低落而亟待振興的情況，可見 Alfred Rupert Hall,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A History, 1819-1969*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9), pp. 1-9.

⁵⁷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 21.

Richardson) 爵士於一八四六年出版的《中國與日本海域魚類學報告》(*Report on the Ichthyology of the Seas of China and Japan*) 之重要資訊來源。這些魚類標本現存於劍橋大學的動物學博物館 (University Museum of Zoology)。⁵⁸ 由現存的資料可看出，瓦契爾在中國居住的期間雖不算長，但收集成果頗豐。

擔任博物館秘書的小李富士是在一八二七年抵達中國，與他較具知名度的父親老李富士一樣，在東印度公司擔任茶葉檢查員。他在澳門、廣州前後居住三十年，也將許多自然史標本送回英國。⁵⁹ 他在一八三二年加入倫敦林奈學會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一八三四年也成為倫敦園藝學會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和皇家學會的成員。他跟父親同為自然史愛好者、植物及動物收藏家，將許多中國植物介紹到英國，尤其是他引入的蘭花，培育相當成功。

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結束後，小李富士於一八三六年七月進入顛地 (Lancelot Dent) 的公司工作。一八三九年，他與表妹伊莉莎白·康威 (Elizabeth Conway) 結婚。這位女士是位傑出的業餘畫家，可能因為受到公公所帶回的中國花鳥動物畫所影響，她也畫了許多帶有中國風的花卉圖畫。一八七七年小李富士過世後，康威將家中兩代所收藏的極具科學價值的中國風格標本圖畫捐給了當時的大英博物館自然史分部（即現在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之前身）。⁶⁰ 這批收藏也成了晚近討論中國自然史標本畫時經常被引用的材料。⁶¹

⁵⁸ Peter James Palmer Whitehead and Kenneth Alan Joysey, "The Vachell Collection of Chinese Fishes in Cambridge," *The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Zoological Series* 15.3 (1967): 121-165.

⁵⁹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p. 263-266.

⁶⁰ Peter James Palmer Whitehead and Phyllis Irene Edwards,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Selected from the Reeves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1974), p. 17.

⁶¹ 例如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一書第二章。另亦可參考：Judith Mage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2011)。事實上，僱用當地畫師來做植物畫的方式，老李富士並非最早、也非唯一的個案，就此題目所涉及的人物來看，除了老李富士之外，比爾、克爾等人也曾這樣做，另外治理過新加坡的萊佛士 (Stamford Raffles) 和法克 (William Farquhar) 也同樣僱用中國畫師製作標本畫，見 William Farquhar, et al.,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The Complete William Farquhar Collection: Malay Peninsula, 1803-1818*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10)。在印度的羅克斯堡 (William Roxburgh) 亦曾僱用印度畫師來協助製成植物畫，並且出版流傳。但此題目已超出本文主題範圍，留待日後另文討論。

戴麗娟

負責博物館財務的克拉克是在一八二五年抵達廣州，一八三九年離開。他初期擔任東印度公司的書記 (writer)，並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和粵語。他的老師稱讚他的中文程度進步很快，據稱他在一八三〇年已能流利的講中文並正確地翻譯中文。公司的董事也認為未來若馬禮遜不能繼續擔任公司的翻譯，克拉克將是一個可以接替的人選。⁶² 也因為他的中文好，除了曾先後擔任公司的書記及貨監外，也與同事阿司泰勒 (John H. Astell) 同任東印度公司的 Finance Committee Agents。⁶³ 因此在一八三四年四月公司在中國據點撤銷後，他們被指派負責處理公司解散後的各項事務，在廣州留至一八三九年才離開。⁶⁴ 目前的資料並未顯現克拉克是否也收集標本。

(六) 博物館藏品捐贈者與支持者

博物館的運作除了前述幾位之外，還有賴許多自然標本收集者捐贈藏品，目前曾被提及的藏品捐贈者有幾位，第一位即是前述的老李富士。⁶⁵ 他自一七九〇年十六歲開始在倫敦茶商公司作學徒，一八〇八年轉到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做驗茶的工作，一八一一年被公司派到廣州商館擔任助理茶葉檢查員。他在出發前，經由已是皇家學會會員的同名堂兄 (John Reeves, 1752-1829) 介紹，與學會會長、亦是邱園非掛名總管的班克斯 (Joseph Banks, 1743-1820) 見面，受託收集中國植物寄回給邱園。當時，邱園派遣的第一位專業園丁克爾 (William Kerr, c. 1782-1814) 已經離開廣州，轉赴錫蘭 (詳後)，班克斯正愁沒有固定可以委託的對象，老李富士正好填補這個空缺。⁶⁶ 他在一八一二年秋天到達中國後，很快就認識潘啟官二世潘有度 (1755-1820) 之兄潘有為 (1744-1821，英人稱之 The

⁶² Susan Reed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46-82.

⁶³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Alphabetical List of Persons; List of Commercial Houses and Agents; to Which are Added a List of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the Names of Foreign Consuls, and of the Hong Merchants and Linguist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5.9 (1837): 426-432.

⁶⁴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379.

⁶⁵ 見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⁶⁶ Jane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td., 2007).

Squire)，⁶⁷ 得以參觀其知名花園內數千盆的花。他與其他比他早到廣州，又和他分享同樣興趣的人如托瑪斯·比爾 (Thomas Beale, 1775-1841)、馬禮遜、李文斯頓 (John Livingstone, c.1770-1829) 等多有往來，在一八一六年短暫回英休假時，他也主動聯繫倫敦園藝學會，提供合作的機會。也是在此行，他向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的圖書室借了一些植物畫回廣州，以便讓在當地僱用的畫師知道他們所要求的植物寫生的模樣。一八一七年初他回到廣州後，開始陸續寄送中國植物畫給園藝學會，一八二一年底已經寄送了三百幅，並因此獲得園藝學會頒發的一個獎章，表揚他的貢獻。由於他之前已經寄了許多植物種子和株苗給邱園，在其堂兄和其他會員推薦下，他於一八一七年成為皇家學會的會員，同時亦加入英國林奈學會。一些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受惠於他所寄送的標本，因此將鑑定後的新物種之學名以他的名字命名，以感謝他。他將其中一套標本畫陸續寄給贊助他的倫敦園藝學會，另一套自己保存，到他一八三一年退休返英時，已累積了兩千多件精美的花鳥動物標本畫。正如前述，在他過世後，這批圖畫交由其子小李富士保存，但在後者也過世後，其媳婦將這些收藏都捐給大英博物館自然史部門，現在典藏於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倫敦因此藏有至少兩套由老李富士僱用中國畫師所完成的標本畫。一八三一年退休返英後的老李富士仍保持對中國園藝植物的興趣，而且在倫敦園藝學會的一個中國委員會 (China Committee) 扮演重要的顧問角色。一八四二年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後，倫敦園藝學會派遣福鈞 (Robert Fortune, 1812-1880) 至中國採集植物，就是由這個委員會所推薦的。福鈞在更後來的另一次採集旅程中成功地將優良茶種由中國引入印度試種，老李富士可說是其中的推手之一。⁶⁸

另一位被提及的採集品捐贈者是與馬禮遜一家交誼深切的李文斯頓。⁶⁹ 他從一七九三年開始就因為擔任船醫而隨著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多次出入中國，一八〇

⁶⁷ 關於潘有為生平，可見潘劍芬，《廣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1714-1911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101-103。

⁶⁸ Alistair Watt, *Robert Fortune: A Plant Hunter in the Orient* (Kew, Surrey: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2017), pp. 19-20.

⁶⁹ 李文斯頓是馬禮遜的家庭醫生，當馬禮遜第一任妻子因霍亂而在一八二一年六月十日過世時，李文斯頓隨侍在側。妻子死後的秋天，馬禮遜必須赴廣州商館工作，也把不能隨行的幼女 Rebecca 暫時託給李文斯頓夫妻照顧。此人在華所採集之植物有在歐洲留下記錄者，可見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p. 266-268。但此書中對其生平描述較不完整。

戴麗娟

八年因受東印度公司僱用為商館助理醫生而長駐澳門。他本身也是一位植物學愛好者，公暇之餘在澳門與廣州一帶收集許多植物來自行試種與研究。因本身職業的關係使他對中醫草藥有興趣，也由於他與馬禮遜兩家交誼甚好，因此他請馬禮遜協助將中文本草的書籍譯成英文。⁷⁰ 他們兩人在一八二〇年夏天曾短期於澳門設置一個濟貧的小型診所，並僱用當地中醫師和草藥師協助治病。⁷¹ 馬禮遜在收到英國不同單位的問題和請求時，有時會請李文斯頓協助答覆。例如在一八一九年初，愛丁堡大學校長貝爾德博士 (Dr. Baird) 因計畫寫一本全球的貧窮史，寫信來詢問有關中國窮人的數目、救濟情況等等，馬禮遜就是把李文斯頓的相關觀察和說明寄給他，還告訴對方，李文斯頓會在當年寄幾個中國人的頭骨給對方所負責的學校的博物館，那是幾個因為在澳門搶奪一艘美國船而被判刑斬首的中國人頭顱。⁷² 老李富士於一八一二年加入廣州商館後，一開始就是在李文斯頓的導覽下環遊澳門一圈，⁷³ 之後兩人經常在公忙之餘一起出外採集植物標本。在老李富士的推薦下，李文斯頓在一八一七年也成為倫敦園藝學會的通訊會員，之後常在該學會刊物發表與中國植物有關的文章。⁷⁴ 他在華前後陸續寄送植物回英國給園藝學會、邱園，也曾多次寄給在格列斯哥的胡克及當地植物園等，直到一八二六年返回英國為止。根據胡克的說法，李文斯頓大概早在一八〇五年就曾把廣州的蘆草紙（當時稱為 rice paper）帶回歐洲。⁷⁵ 一八二九年李文斯頓啟程來華復職，但途中於海上過世，在廣州商館工作的資歷約十八年。⁷⁶

⁷⁰ John Livingston, "Treatment of Certain Diseases by Chinese Doctors," *Indo-Chinese Gleaner* 3.15 (1821): 5-8.

⁷¹ "Historical Landmarks of Macao,"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 (1887): 392-393.

⁷²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31.

⁷³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186.

⁷⁴ 見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p. 266-268. 這些文章有一部分也轉載於《印中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 中，此刊物正是由馬禮遜和米憐主編。見此雜誌重刊本：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米憐 (William Milne) 主編，《印中搜聞》(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⁷⁵ William J. Hooker, "Some account of the substance common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Rice Paper*," *Botanical Miscellany* 1 (1830): 88-91.

⁷⁶ 蘇精，〈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西醫來華〉，頁 49。

除了這些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外，另有一些博物館藏品的捐贈者屬於十八世紀末、尤其是十九世紀初在廣州貿易中出現的英國散商集團成員。例如擁有著名花園和鳥園，也曾經捐贈標本的資深英僑托瑪斯·比爾就是其中一員。比爾為蘇格蘭人，至遲在一七九六年就已到達廣州，此後至死都未曾返回英國長住。他與比他更早到達廣州的哥哥丹尼爾·比爾 (Daniel Beale, c.1758-1842) 都是在十八世紀末就在廣州活躍的散商，俗稱港腳商人 (country merchant)。

當時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雖被東印度公司壟斷，但是東印度公司允許一些散商的存在，條件是這些英籍散商必須取得他們發出的執照，並且受其管轄。不過因為部分散商曾經在廣州當地造成一些衝突，一七七〇年代末，東印度公司在倫敦的董事會嚴格要求不屬於公司廣州商館的英國人不得居住於中國，幾年間成功地限制了散商的活動範圍。一七七九年，一位英國散商里得 (John Reid) 無意中找到破解此限制的方式，因為他取得奧地利的歸化證件，並且取得奧地利皇帝委任在廣州奧地利商館做事的委任狀，如此就可不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管轄。雖然在八年後，奧地利帝國公司破產，里得也離開中國，但是這種拿外國委任狀和證件的方式成了當時一些英國散商用來規避英國東印度公司管轄的管道。⁷⁷ 一七八七年，丹尼爾·比爾也採用此法，帶著普魯士國王的委任狀來到中國，⁷⁸ 並且和當時唯一符合東印度公司規定條件的散商寇克斯 (John Henry Cox) 合作開設洋行，成立了寇克斯及比爾洋行 (Cox & Beale)，承接原本由寇克斯和里得經營的生意。寇克斯於一七九一年過世。不久，托瑪斯·比爾來到廣州擔任其兄的秘書。⁷⁹ 一七九八年，丹尼爾離開廣州，托瑪斯接收兄長留下的職位，擔任普魯士領事，持續到至少一八一四年。托瑪斯·比爾與查理·麥尼克 (Charles Magniac, 1802 年起擔任普魯士副領事) 合開了比爾麥尼克洋行 (Beale, Magniac & Co.)，主要生意

⁷⁷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5.

⁷⁸ 丹尼爾·比爾在以新身分來到廣州前，原本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一七八九年，他是當時唯一非東印度公司職員而在廣州活動的英國人，另一位是麥克英泰 (McIntyre)，後者長年居住於澳門。丹尼爾·比爾大約在一七九八年離開中國，後於一八四二年過世，死時八十四歲。Lindsay Ride, May Ride and Bernard Mellor,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 254-255.

⁷⁹ Ride et al.,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 253. 因此有一說是他在一七九一年就到中國，而非一七九六年，此點有待查證。

戴麗娟

為進口鴉片與棉花，以及出口茶葉，與當時英國殖民地印度有密切往來，但也不限於此。比爾後來轉做其他投資，事業版圖曾遠達巴西，他將普魯士領事權交給麥尼克，麥尼克家族後又找渣甸 (William Jardine) 承接公司，並把普魯士領事權交給他，之後馬地臣也加入該公司，因此比爾開設的洋行可說是知名的怡和洋行的前身。⁸⁰ 比爾本身後來則因舉債過高、一時週轉不靈而於一八一六年宣告破產。一八四一年比爾疑似自殺，陳屍割狗灣 (Casilha Bay) 岸邊。

由於托瑪斯·比爾是澳門英僑界的資深僑民，本身好客又受當地敬重，因此許多當時曾遊歷或居住過澳門的英美人士在他們的記載中都曾提到比爾的豪宅。但他最為津津樂道的是在風順堂附近的私人花園及鳥園，現已不存。⁸¹ 花園中有多達 2,500 盆的植物。根據前面曾經提及的英國醫師兼自然史學家貝內特的描述，鳥園約 40 英尺長、20 英尺寬、30-40 英尺高，內隔為有門可相隔的兩個部分。⁸² 園內有數百種來自中國、東南亞、澳洲及南美的鳥類，成了當地外僑和外國賓客必定參觀的澳門景點。比爾也讓英國派來的植物獵人將已採集、等待船期的植物暫時栽種在他的花園，將他的花園充當苗圃使用。例如一八二一年受園藝學會派遣的波庇 (John Potts) 就受到比爾這樣的幫助，而比爾也因此得到學會的感謝獎章。⁸³ 瓦契爾在他與劍橋植物學教授韓斯洛的通信中就曾經描述他在比爾鳥園看到六百多種鳥類的經歷。⁸⁴ 貝內特在他的太平洋遊記中也用了大量篇幅討論他在比爾鳥園及花園的所見所聞。⁸⁵ 比爾還收藏有大量知名畫家錢納利的畫作。⁸⁶ 一八一二年才到澳門的老李富士經常拜訪比爾花園，兩人結為好友，比爾也和老李富士一樣，曾經請當地中國畫師將他的鳥園及花園的部分收藏繪製成圖錄，而且應該是在老李富士還未到中國前，比爾就已這樣做。⁸⁷ 他本人收集了大

⁸⁰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pp. 27-28.

⁸¹ Lamas, *Everything in Style*, p. 37.

⁸²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 50.

⁸³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204.

⁸⁴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 45.

⁸⁵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p. 35-79.

⁸⁶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 36. 現今可看到的比爾肖像畫，即錢納利的作品。

⁸⁷ 貝內特在描述中多次提到比爾請中國畫家為園內不同鳥類作畫，而且早在一八〇四年就曾經將雉雞的圖畫寄回英國。見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p. 44, 57, 72 等。

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動植物，也嘗試將一些活體樣本寄回英國，但是成功率不高。⁸⁸ 他的鳥園中最受矚目的是麻六甲來的天堂鳥，其次是中國雉雞，其中一隻他喜愛的中國雉雞死後還被做成填充標本，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帶回歐洲。⁸⁹ 前述之葡萄牙學者蒲加認為比爾也是澳門這個博物館的主要捐贈者之一。⁹⁰ 他亡故後，留下的財物有一部分被以拍賣方式售出，⁹¹ 但花園和鳥園似乎到一八四三年還存在原址。⁹² 從筆者目前查到的資料可知，原本比爾花園中可移動的植物皆於一八四五年被運到香港，移植到顛地在中環的花園 Green Bank。⁹³ 比爾的兒子小比爾 (Thomas Chaye Beale, c.1805-1857)⁹⁴ 原為怡和洋行在廣州的職員，⁹⁵ 約在一八四五年後轉赴上海發展，與顛地等人合夥開設代理公司顛地比爾洋行 (Dent, Beale & Co.)。⁹⁶ 一八四八年，福鈞被東印度公司派到中國採集優良茶種，他在秋天到達上海時，就曾經受到這位小比爾的許多協助，才得以展開後續的採集旅程。⁹⁷

有關這個博物館的參與者，最後必須一提的是英格利斯 (Robert Inglis)，因為他參與了博物館停辦後的善後工作。英格利斯的父執輩原本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⁸⁸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 70.

⁸⁹ Bennett,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vol. 2, p. 57.

⁹⁰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p. 581.

⁹¹ 見 *The Canton Register* 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關其死訊之報導。

⁹² 見一八四三年年終還曾參觀過該地的美國女士 Rebecca Kinsman 之書信中的描述：“Life in Macao in the 1840’s, 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s. Rebecca Kinsman Munroe,”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86 (1950): 25-26.

⁹³ Robert Fortune,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52), p. 6.

⁹⁴ 根據羅哈蕊的日記（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此人為比爾之非婚生子，曾經在英國受教育，平時出入澳門上流社會，見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303. 但現今許多資料都誤以為此人為比爾的堂兄弟或姪子。有關小比爾的生平細節目前不詳，但他在上海曾經捐地蓋教堂，因此在他過世（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三日）後，上海聖三一主教座堂內設有一以他為名的紀念牌，由此可追溯其生卒年。

⁹⁵ Alain Le Pichon, ed.,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4.

⁹⁶ 見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414.

⁹⁷ 莎拉·羅絲 (Sarah Rose) 著，呂奕欣譯，《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臺北：麥田，2014），頁 66。但此作者在此處將比爾父子混為一談，其實當時老比爾早已過世。

戴麗娟

董事會成員，⁹⁸ 他本身也加入公司，於一八二三年到達廣州商館擔任書記，一直到一八三九年五月底才離開該地。⁹⁹ 他到達後積極學習中文，是學生中程度較佳的，因此在一八二五年曾經獲得公司提供的 100 英鎊的學生獎助。¹⁰⁰ 在公司工作之餘，他也是位旅行家，足跡遍布亞洲，曾到訪過印度喜馬拉雅山區，並將他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與親友分享，如羅哈蕊在日記中便曾多次提到他的旅遊札記。¹⁰¹ 他於一八二五年受邀成為顛地寶順洋行的合夥人，¹⁰² 遂辭去公司職位，公司委員會因此對他的行為相當不滿。由於他是顛地的生意夥伴，在林則徐禁菸時，他因為能說中文，因此也扮演了說客的角色居中協調。¹⁰³ 除了本身的事業之外，英格利斯似乎參與較多文化事業，例如他是一八三四年十一月成立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的第一任財務 (treasurer)，同時也是一八三五年成立的馬禮遜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之創始會員，¹⁰⁴ 並曾在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辦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投稿。¹⁰⁵ 他與此博物館的關聯是，博物館在一八三四年隨著公司撤離澳門而停辦，英格利斯在一八三六年四月將此博物館的部分剝製立體標本（包括鳥類及小型哺乳類動物共 148 件）送給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這個學會在其會議中因此有相關報告。¹⁰⁶

由這些零星資料可看出，澳門這個不列顛博物館的案例裡一再出現加爾各答身影，顯示英人在澳門有關自然史標本的收集、保存、運送可能受到在印度已經累積的經驗影響。不僅在一開始宣傳的文章中就提到加爾各答博物館，此博物館

⁹⁸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68.

⁹⁹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 403.

¹⁰⁰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p. 80.

¹⁰¹ Hodges and Hummel,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vol. 1, pp. 270, 327, 365.

¹⁰²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68.

¹⁰³ Patricia Lim,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9.

¹⁰⁴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Names of the Trustees and Members, with Remarks Explanatory of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5.8 (1836): 373-381.

¹⁰⁵ 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7.2 (1973): 169.

¹⁰⁶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Wednesday Evening, the 4th May, 1836,"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5.52 (1836): 245-254. 與此事相關之報告在頁 249。

結束後，也將一部分標本送給該博物館。因此我們有必要瞭解當時英人在加爾各答所建立的自然史資訊與標本的交流網絡與澳門之間的關係。

貳·英屬印度加爾各答在自然史方面與澳門之交流

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當時原名為「在東印度貿易的倫敦商人公司」(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取得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頒予的皇家特許狀，在所謂的「東印度」地區取得貿易壟斷權，之後先是與葡萄牙在香料群島競爭，並於一六〇八年開始試圖在印度西岸的蘇拉特 (Surat) 建立貿易據點，復又與荷蘭、法國、丹麥等國角逐在印度半島的貿易勢力，在蘇拉特之後，漸次以購買或戰爭的方式取得孟買 (1638)、馬德拉斯 (1639)、維沙卡帕特南 (Visakhapatnam, 1682)、胡格利 (Hooghly, 1685)、加爾各答 (1690) 等貿易據點，並且建立鞏固其勢力的三大管轄區：孟買管轄區 (Bombay Presidency, 1662 年建立)、馬德拉斯管轄區 (Madras Presidency, 1684 年建立) 和孟加拉管轄區 (Bengal Presidency, 1765 年建立)，持續擴張。其中孟加拉管轄區雖是最晚建立，但逐漸成為英國在印度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管轄區中的加爾各答則從一七七二年開始成為英屬印度的首都，直到一九一一年為止。與本文主題有關的亞洲學會與其博物館，以及加爾各答植物園等，都是在這段期間陸續出現。¹⁰⁷ 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 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及其博物館

在最高法院法官威廉·瓊斯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的鼓吹下，第一個亞洲學會在一七八四年一月十五日於加爾各答成立，名稱為 The Asiatick Society。瓊斯本身不僅是一個法律人，也是一個能操持多種古語文的古典學者，

¹⁰⁷ 有人稱這段時間為「孟加拉文藝復興」，相關討論可見：Amit Sen, *Notes on the Bengal Renaissance*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ombay, 1946); David Kopf, *British Orientalism and the Bengal Renaissance: The Dynamics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1773-183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Subrata Dasgupta, *The Bengal Renaissance: Identity and Creativity from Rammohun Roy to Ra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7).

同時對植物學也充滿興趣。¹⁰⁸ 根據瓊斯起草的學會宗旨來看，這個在孟加拉管轄區的學會以亞洲為範圍，將對當地所有人文與自然產物進行研究。¹⁰⁹ 由於這樣的宗旨，這個學會並不限於人文研究，多位對印度自然生態有興趣的自然史學者也曾加入，例如林奈的學生寇尼哥 (Johann Gerhard König, 1728-1785) 就是創始會員，後來擔任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的羅克斯堡 (William Roxburgh, 1751-1815) 和瓦立池 (Nathaniel Wallich, 1786-1854) 都是這個學會的會員。

在加爾各答之後，常駐孟買的英人社群也在一八〇四年於當地成立類似目標的學會，名為 The Bombay Literary Society。一八一二年，馬德拉斯跟進，因此有了 The Madras Literary Society。一些曾經在印度亞洲學會活動的英國知識份子返回英國後，把亞洲研究的學會組織帶回英國本土，以數學家兼梵文專家寇布魯克 (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 為首，促成一八二三年於倫敦成立的亞洲學會，並因為此舉取得國王的支持，而得以將該學會正式取名為「大英與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¹¹⁰ 寇布魯克本身在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五年間曾擔任加爾各答亞洲學會的會長，他在倫敦亞洲學會是重要的發起人，但婉拒擔任首任會長 (president)，而擔任主任 (director)。有重要中國經驗的小斯當東也在學會的組成委員會中，並被推舉為四位首任副會長 (vice-president) 之一，在其中扮演中國研究的顧問。由此可知，這類以亞洲為研究對象的學會組織是由殖民地伊始，再傳回英國本土，而不是從帝國中心先成立才輻射到各殖民地。不過因為倫敦的學會成立後，孟買的學會於一八二九年率先成為其支會，倫敦學會因此在同年向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提議兩會合併，¹¹¹ 後者同意在形式上變成倫敦總部的一個支會，但其名稱當時並未改

¹⁰⁸ 薩依德在其書《東方主義》中曾數次提及瓊斯之名，但並沒有針對瓊斯進行研究，也沒有說明這個亞洲學會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此處因此不對薩依德的論述展開討論。

¹⁰⁹ “The bounds of investigations will be the geographical limits of Asia, and within these limits its enquiries will be extended to whatever is performed by man or produced by nature.” In William Jones, “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Asiatick Researches* 1 (1788): ix-xvi.

¹¹⁰ 此學會正式冠上皇家二字是在一八二三年六月七日的會議。見 Frederick Eden Pargiter, ed., *Centenary Volume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1923*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p. ix.

¹¹¹ Amalendu De,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iatic Society (1766-1835)* (Kolkata: Asiatic Society, 2003), p. 117.

變。¹¹² 馬德拉斯的學會不久也循此模式與倫敦之學會連結。後來陸續在亞洲其他城市成立的類似學會自然地把位於倫敦的學會視為總部，而申請加入成為其支會，以取得皇家認可的頭銜為榮，可能因為如此，中文學界往往以為倫敦的亞洲學會為第一個，而忽略了印度孟加拉區的英僑才是這一系列亞洲學會之先驅。總計在倫敦之後，還有斯里蘭卡的可倫坡 (1845)、香港 (1845)、上海 (1857)、橫濱 (1872)、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 (1877)、北京 (1885)、首爾 (1900)、印度班加羅爾 (1909)、緬甸仰光 (1910)、加拿大蒙特婁 (1911)、印度班吉布爾 (1915) 等地英人陸續成立類似學會，並申請成為支會。雖然其中有些支會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例如蒙特婁的學會只維持四年），但也有五個以上的支會至今猶存，或是中斷後再復甦（例如香港支會便是在中斷一世紀後在一九六〇年代復甦）。¹¹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會多半都出版會報，提供會員發表其研究的園地，同時也刊登學會活動與年會記錄。各地不同的學會之間可能會互贈刊物，而海外的學會也會與英國、歐陸、美國的學術機構互贈刊物，如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研究資訊交流網絡。例如在加爾各答學會早期的通信記錄中，就可見到學會秘書收到來自皇家愛爾蘭學院 (Royal Irish Academy)、美國哲學會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皇家愛丁堡學會 (Royal Edinburgh Society)、法國崗城農商學會 (Societ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of Caen)、巴黎地理學會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倫敦園藝學會 (Horticultural Society)、倫敦藝術學會 (Society of Arts)、倫敦古物學會 (Society of Antiquaries) 等機構的來信，感謝他們寄送刊物，同時也回贈其機構的出版品。而且這類的往來從一八二〇年代開始明顯增多也愈規律。¹¹⁴

加爾各答亞洲學會初創時並沒有本身的建築物，直到一八〇八年開始才有專屬的建築物和會址。也是在規劃這個建築物之用途時，會員們感覺到成立附屬

¹¹² Rājendralāla Mitr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in *Centenary Review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rom 1784 to 1883* (Calcutta: Thacker, Spink and Co., 1885), p. 3.

¹¹³ 有關各地支會成立之初的部分細節，見 Pargiter, *Centenary Volume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1923*; C. F. Beckingham, "A Histo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3-1973," i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ed. Stuart Simmonds and Simon Digby (Leiden: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E. J. Brill, 1979), pp. 1-77, 尤其是 pp. 16-17。各支會成立之一覽表，請見附錄。

¹¹⁴ De,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iatic Society*.

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必要。¹¹⁵ 其中圖書館的部分隨即成立，藏有不少歐語和當地語言出版的書籍和會員陸續捐贈的古籍、手稿、地圖等，但博物館卻遲遲沒有下文。在加爾各答植物園任職的瓦立池也是這個亞洲學會的成員，由於見到學會自成立以來所累積的各種文書類以外的收藏品未被有系統地保管和研究，他因此在一八一四年鼓吹該學會成立博物館，並且表示願意捐贈自己的一些收藏，也願意義務地照管博物館。他的熱心在當地得到迴響，總督同意自公家經費中撥款支持，學會也在其所在建築物的一樓撥出幾間房作為展覽室，亞洲學會的博物館就此成立，並請瓦立池擔任第一任（無給薪）管理人。¹¹⁶ 這個博物館後來被稱為「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 of Calcutta)，在印度獨立後改成國立博物館，至今猶存，也被現今國際博物館學界的研究者公認為是亞洲第一個博物館。¹¹⁷ 這種先成立學會，繼而建置附屬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方式，之後多少成為其他亞洲學會仿效的模式，例如孟買的亞洲學會便在成立後一年設立博物館。前述倫敦的亞洲學會也有同樣的設置。澳門英人社群原先也打算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撐博物館的活動，他們的參照對象很可能便是這個印度博物館。¹¹⁸ 在澳門博物館解散後，部分生物標本被直接捐給這個印度博物館，而非如一般認為都送到英國，可見兩個亞洲博物館的參與者之間可能早已互有交流。

從目前零星的資料中，可查到小斯當東至遲於一八〇八年就已經成為加爾各答亞洲學會的會員。¹¹⁹ 一八一〇年他的《大清律例》英譯本出版後，他也送了一份給這個亞洲學會的圖書館。¹²⁰ 一八一七年六月徹底返英定居後，他加入許多學會，並且與寇布魯克一起促成倫敦的亞洲學會的成立。當時他也立即寫信邀

¹¹⁵ Mitr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p. 22.

¹¹⁶ Trustees of the Indian Museum, *The Indian Museum, 1814-1914*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14), pp. 1-2.

¹¹⁷ John M. A. Thompson, ed., *Manua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Oxford and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2), p. 14.

¹¹⁸ 見前引資料 "British Museum in China," *The Canton Register* 1829.03.02.

¹¹⁹ "Member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Instituted in Bengal,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0 (1808).

¹²⁰ "List of Donations to the Library of the Asiatick Society, since 1810,"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Instituted in Bengal,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2 (1816): xi.

請人在中國的馬禮遜加入。¹²¹ 在這封日期為一八二三年四月十三日的信中，小斯當東還提到，新成立的學會要建立圖書館和博物館，他躬先表率，已將自己的三千多冊中文藏書捐贈給該學會圖書館。¹²² 在此之後，小斯當東還陸續捐贈一些與中國有關的畫作和物件給該學會的博物館，¹²³ 其中包括乾隆賞賜給他的荷包袋。¹²⁴ 由這些信件內容可知兩人對於亞洲學會的組織運作模式並不陌生，是否因此想在澳門推動成立類似學會，進而成立博物館？由於直接史料不足，無法得知細節，但就發生的時間點來看，澳門這個學會附帶博物館的醞釀，或許曾受到小斯當東的鼓勵，這可能也是為何馬禮遜會在信中提及。事實上，在上述一八二三年的信件往返後不久，馬禮遜就在同年底啟程返英。這是他在來華十六年後第一次回鄉述職，在英國前後共停留了兩年多，直到一八二六年中才攜眷再度來華。在英期間，他與小斯當東有許多接觸，還曾經因為養病而接受後者的邀請，到其莊園 Leigh Park 居住一段時間。由此來看，讓小斯當東瞭解博物館成立的情況，似乎是延續兩人之間的一些討論話題。

（二）加爾各答植物園

除了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之外，若要瞭解在廣州、澳門的英國人與加爾各答之間所建立的自然史知識交流管道，就必須要瞭解瓦立池所服務的加爾各答植物園 (Calcutta Botanic Garden)。¹²⁵

¹²¹ 有關馬禮遜與小斯當東之間的關係，最早可回溯至馬禮遜在來華之前，透過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寫信介紹，讓兩人結識。兩人年紀其實只差一歲，但由於小斯當東的中國閱歷自馬戛爾尼使節團就開始，累積經驗較多，所以馬禮遜一直把小斯當東當資深前輩看待，而小斯當東也非常提攜這位後進。兩人的好交情從一八〇七年初見後就從未間斷。一八一七年返英定居的小斯當東透過捐款及其他方式贊助馬禮遜在東亞的辦學和翻譯印刷出版事業，馬禮遜也不定期以書信報告他們在華的種種活動。見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第五章〈馬禮遜與斯當東的情誼〉，頁 109-128；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p. 59。兩人之通信散見於馬禮遜遺孀編輯之馬禮遜回憶錄：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¹²²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p. 229-233.

¹²³ Derek Gladwyn, *Leigh Park: A 19th Century Pleasure Ground* (West Sussex: Middleton Press, 1992), p. 43.

¹²⁴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p. 46.

¹²⁵ Ray Desmond,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Indian Flora*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2).

加爾各答植物園成立於一七八七年，一開始是由孟加拉管轄區軍事監督部門秘書基德中校 (Robert Kyd, 1746-1793) 在一七八六年提議，經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總督同意和支持，再送計畫書給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總部。總部詢問其顧問班克斯，在班克斯大力支持下成立。¹²⁶ 成立之初的目的有二：一是著眼於解決當地饑荒問題，必須種植能夠大量生產的糧食作物；第二則是種植能夠供應內需和可能有外銷價值的經濟作物。¹²⁷

基德中校於一七九三年過世，此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曾經擔任該植物園總管 (superintendent) 一職並且致力於基礎建設的有羅克斯堡 (William Roxburgh, 1751-1815, 1793.11-1813 年擔任此職)、瓦立池 (1815-1817 年代理、1817-1846 年正式擔任此職)、¹²⁸ 法康諾 (Hugh Falconer, 1808-1865, 1847-1855 年擔任此職) 等人。在他們任內，該植物園被建設成東印度公司轄下最大的植物資訊和種子交換中心。若以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來看，這個植物園是僅次倫敦皇家植物園之後、全帝國第二大的植物園，正如加爾各答是繼倫敦之後，帝國的第二大都市。¹²⁹ 這個植物園在一開始雖為實用目的而建立，但後來也逐漸朝向科學研究發展，尤其是從有專門植物學訓練背景的羅克斯堡接任之後。到了一八〇七年，連一向看重貿易利益的東印度公司總部本身也正式認可這點，¹³⁰ 因此有一些看來沒有經濟利益，可能純粹是為了保存、研究目的的舉措出現。

此植物園面積極大，從一開始就有移植各地不同作物來實驗栽培的性質，因此兼具農林試驗場、苗圃、植物園等功能。為了這些目的，從建立之初，主事者就從英國本土及海外屬地徵集各類實用植物。當時從英國引進的主要是歐洲

¹²⁶ 事實上班克斯與東印度公司一些人士都受到法國人 Pierre Poivre 在模里西斯島的作法的啟發，因此支持加爾各答植物園的計畫。見 Richard H.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41. 此書中第五章則專門討論 Poivre 在模里西斯島的作為。

¹²⁷ 英國東印度公司特別注意經濟作物的開發多少也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影響。有關兩個公司之間的競爭，可參考：Chris Nierstrasz, *Rivalry for Trade in Tea and Textiles: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 (1700-180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¹²⁸ 在羅克斯堡和瓦立池之間有寇布魯克和布克南 (Francis Buchanan, 1762-1829) 短暫代理該職。有關此植物園的沿革，可參考 Desmond,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Indian Flora*.

¹²⁹ Adrian P. Thom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Plant Transfer, Science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6-180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2 (2006): 177.

¹³⁰ Thom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p. 175.

樹種，例如一些果樹，還有能夠提供造船用料的樹種，如柚木 (teak) 等。至於海外屬地，一開始則主要是與位於加勒比海的聖文森島 (Saint Vincent) 植物園交流。該地長期為英、法所爭奪，兩國都宣稱有其領權，一七八三年英國終於從法國手中正式奪得此島，並積極建設早在一七六五年即在當地成立的一個小型植物園。¹³¹ 一七八七年成立的加爾各答植物園雖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以成立時間點來看，還是在聖文森植物園之後。除此之外，英人於一七八六年取得檳榔嶼 (Penang)，在一七九六年也在當地建立植物園，此處也屬於與加爾各答的植物交流之列。一七九六年，英人又從荷蘭人手中取得斯里蘭卡（舊稱錫蘭），建立英屬錫蘭，在班克斯的規劃下，¹³² 也於一八一一年在其首都可倫坡 (Colombo) 試圖在原來荷蘭人建立的植物園基礎上擴大，雖然初期發展狀況並不理想，但此處也與加爾各答植物園多有往來。¹³³ 除了上述這些地方，在亞洲陸續成立的英屬植物園和植物站 (botanic stations) 還有位於印度北部的薩哈蘭普爾 (Saharanpur, 1817)、印度西南的班加羅爾 (Bangalore, 1819)、錫蘭中部的佩拉丹尼亞 (Peradeniya, 1821)、新加坡 (1822)、印度西岸的達普里 (Dapurie, 1828) 等。¹³⁴

除了這些在亞洲陸續建立的植物園，與加爾各答植物園往來的對象中，還有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英屬植物園是在非洲西岸外海的聖海倫娜島 (Saint Helena)。當時從亞洲經過印度洋、或從西印度群島橫跨大西洋的船隻在返回英國的旅途上，都會先經過這個島，因此在連接地中海與紅海、讓船隻可大幅度縮短航程的蘇伊士運河開通 (1869) 前，這個小島是英屬船隻在大西洋重要的船舶停靠站和植物交換站。當時南非好望角雖也是船隻必經之地，但是開普敦主要在荷蘭人控管之下，英國東印度公司並未在當地建立植物園，因此聖海倫娜島對植物傳輸有其重要性。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此島的歷史是從一六五九年開始，當時英國無視荷蘭曾經占領的事實，聲稱占有該島並開始殖民。一七八七年開始，在加爾各答

¹³¹ Thom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p. 170.

¹³² Neil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1768-182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2014), vol. 7, p. 477.

¹³³ 班克斯並推薦原來派在廣州與澳門採集植物的克爾，前往可倫坡擔任第一任植物園總管。有關克爾，請詳後。

¹³⁴ Donal P. McCracken, *Gardens of Empire: Botan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Victorian British Empire* (London and Washingt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1-213.

植物園創立者基德中校的建議下，東印度公司也在聖海倫娜島當地建立一個植物園。當時從中國、印度、美洲所採集的植物在運輸到倫敦的路程中，通常會在停留該島的時期進行盤點重整，包括棄置已經死去的植物，或是將因為長途航行而奄奄一息的植物先種植在當地植物園，等情況改善後，才由後面的船班運往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植物園。¹³⁵ 也因為如此，曾出現體質在旅程中耗損的中國植物在此處長期寄養，直到完全移植成功才將一部分送往英國的情況。例如在一八〇七年初從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主席職位退休的多林文 (James Drummond, 1767-1851) 在返英途中給班克斯的一封信中就寫道，他所協助運送的植物有一半以上都沒辦法再撐過下面兩個月的航程，因此在聖海倫娜島停留期間決定將這些植物先委託給當地植物園總管照顧。而且他目睹許多從遠東運來的植物在當地不必特別照料就生長茂盛，因此認為在當地發展栽培工程，也許會比一口氣要將東方植物直接運往英國為更可行的辦法。¹³⁶

事實上，十九世紀中葉正是英國海外各屬地嘗試建立當地植物園的鼎盛時期，而這些植物園彼此之間亦形成互相交流的網絡。雖然各地植物園的建立與關閉並非出自皇室的意旨，但若以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的一八三七年與駕崩的一九〇一年作為基準點來比較，在一八三七年，大英帝國約有 10 個海外英屬植物園存在，到了一九〇一年，已經有 126 個植物園。¹³⁷ 足見這段時間，建立植物園已經是殖民地的基本配備，雖然並非每個殖民地的植物園都能持久存在。在這大英帝國的植物園網絡之中，位於倫敦的邱園雖然扮演核心至要的角色，但是邱園在一八二〇年班克斯過世後，其實經歷將近二十年的蕭條期，甚至差點要被解散，一直到胡克擔任總管（1841-1865 年擔任此職）後，邱園才逐漸重振。¹³⁸ 在這段期間以及之後，不完全受邱園命令而擁有相當自主性的加爾各答植物園則一直是海外最大的植物交換中心，每年往往寄出數千至數萬種栽培成功的植物給有往來

¹³⁵ McCracken, *Gardens of Empire*, p. 102.

¹³⁶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p. 266-267.

¹³⁷ 此處的數字乃參考 Eugenia W. Herbert, *Flora's Empi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 143. 若依照 McCracken, *Gardens of Empire* 一書附錄所列植物園清單來計算，所得數字會稍有出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有些壽命長短不一的小型植物站並未被前者列入計算。

¹³⁸ Ray Desmond,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Lond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2007), chapter 9.

的機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邱園總管的薪資還遠不如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的薪資，大約僅及其半數，可見後者的份量。¹³⁹ 所以在植物標本輸送的歷史中，邱園並非總是扮演核心的角色，這點是我們在分析澳門博物館出現前後有關中國植物輸出情況時必須瞭解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這段時期，廣澳英人社群與加爾各答植物園之間逐漸形成的往來聯繫，可能才是要重建這段歷史的我們更應檢視的一環。

（三）十九世紀加爾各答植物園與廣、澳英人社群之來往

關於從中國有計畫、有規模地運送植物到加爾各答植物園栽種的行動，最早應該是在一七九〇年二月，由一位庫明船長 (Captain Cumming) 護送大批植物，包括肉桂、桃、梨、橘、荔枝、芒果、山竹、紅毛丹、茶、越橘、竹、玫瑰、長年開花植物等，從廣州抵達該植物園。根據文獻所載，出發時總數應有 5,621 株，但由於不耐海上運輸，到達時已有 2,584 株植物死亡，存活的有 3,037 株。其中死亡數字最高、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茶株，到達時有 2,000 株茶苗已經報銷，只剩下 272 株茶苗還活著。¹⁴⁰

一七九三年中，馬戛爾尼使節團到達中國，在中方官員的允許下，團員沿途做了不少調查記錄和採集的工作。¹⁴¹ 使節團回程抵達廣州並準備返英時（一七九四年三月），馬戛爾尼便讓隨團的「天文生」登維德 (James Dinwiddie, 1746-1815) 將沿路採集到的一部分中國植物帶到加爾各答植物園試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江西採到的茶株，其他還包括漆樹 (varnish tree)、烏柏 (tallow tree) 等。¹⁴² 登維德於九月二十七日抵達加爾各答，但是大部分的植物經過船運折騰都已奄奄

¹³⁹ Richard Harry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3.

¹⁴⁰ Dawson Turner Copies, Joseph Banks Correspondence, Department of Botan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ndon, vol. 7, f. 64, List of plants brought from China to the Company's Botanic Garden at Calcutta by Capt. Cumming, 12 Feb 1790.

¹⁴¹ 見該使節團回國後出版的報告，主要由副使老斯當東匯集而成：George Leonard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G. Nicol, 1797).

¹⁴²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2), p. 182.

一息，雖然經過新任植物園總管羅克斯堡的努力，但後續栽種的情況仍然令人失望。¹⁴³

一七九六年前後，羅克斯堡曾經要求往返廣澳與印度之間的船長們幫忙多帶一些中國甘蔗和茶樹到加爾各答試種，但數量不多，成效也不佳。到了一八〇三年，在班克斯的主導下，倫敦邱園派了一位專業且全職的植物採集者克爾到中國，¹⁴⁴ 中、印兩地之間的植物寄送數量也隨之增加。克爾原為邱園的園丁，在一八〇三年四月被派到中國採集當地植物，一直到一八一二年三月，被轉派到斯里蘭卡可倫坡擔任當地新植物園的第一任總管，兩年後（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因病在可倫坡過世。他在邱園工作時，受到班克斯的賞識與指導。雖然當時邱園的園丁總管是艾頓（William Townsend Aiton, 1766-1849），但身為英國皇家學會會長（1778-1820 年擔任此職）且深受國王喬治三世倚賴的班克斯才是真正的主導者，因此克爾被派到中國一事以及在中國期間的活動，主要是由班克斯指導。¹⁴⁵ 為了使克爾的工作能順利進行，班克斯除了請託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主管與船長給予行政和運輸支援之外，¹⁴⁶ 也透過通信將克爾介紹給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其他重要英國人士，例如小斯當東、¹⁴⁷ 曼寧（Thomas Manning, 1772-1840），¹⁴⁸

¹⁴³ Tim Robinson, *William Roxburgh: The Founding Father of Indian Botany* (Chichester: Phillimore & Co. Ltd., 2008), p. 133.

¹⁴⁴ Euan H. M. Cox, *Plant-Hunting in China: A History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and the Tibetan Marche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1945;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9. 以英籍採集者而言，在克爾之前，僅有零星的旅行者或是長住但非植物學專業的業餘採集者在中國進行過採集，例如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曾在中國南方居住的船醫克寧漢（James Cunningham）、十八世紀中葉的商館貨監布雷克（John Bradby Blake）、馬戛爾尼使團團員、十八世紀末在廣州商館擔任醫生的鄧肯兄弟（John Duncan and Alexander Duncan）等。有關布雷克的收集，晚近有較新的研究，見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34.3 (2017) 所刊的專號文章。

¹⁴⁵ 見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6, p. 163, 以及 Aiton 給 Banks 的信：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 254. 有關班克斯之中國知識的可能來源，可見程美寶，〈班克斯爵士與中國〉，《近代史研究》4 (2009)：148-149。

¹⁴⁶ 班克斯曾列出支援克爾之植物收集和運輸工作的東印度公司人員名單，見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 193.

¹⁴⁷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 16, from Banks to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2 April 1805).

¹⁴⁸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 256, from Manning to Banks.

還有時任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羅克斯堡等人，以便他們在蒐集中國植物方面能互通有無。例如克爾在一八〇四年底給班克斯寫的一封信就提到他收到羅克斯堡請求寄送種子和植物的信，而且已經照辦。¹⁴⁹ 克爾在華期間，前後寄給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羅克斯堡的中國植物中，有留下記錄與出版的就有五十多種。¹⁵⁰ 他在中國期間也曾就近到呂宋島和爪哇島採集，而在他寄給英國邱園的植物中，雖有許多因為旅途過長而夭折，但還是有多達 238 種是當時歐洲沒有的植物。除了將收集到的中國植物寄至倫敦和加爾各答之外，克爾曾應東印度公司主管的要求，將中國的果樹寄到聖海倫娜島試種。¹⁵¹ 甚至在克爾被轉派到可倫坡新植物園工作的規劃中，也包括在當地增加中國植物運送和移植的存活率之類的考量。¹⁵²

克爾在中國的採集，除了有英人社群的協助，也有廣州當地中國人的協助。例如他在一開始（一八〇三年）就透過廣州商館主管與行商聯繫，希望行商能幫他們收集到中國北方的植物。¹⁵³ 其中潘啟官二世潘有度幫了許多忙，讓他們得以達成任務。¹⁵⁴ 克爾和他在廣州的上司藍斯 (David Lance, 1757-1820) 向班克斯報告此事後，後者從英國寄了一些價值不菲的禮物給潘有度，潘有度也回贈許多禮物，其中包括一株可能是已經活了上百年的矮樹盆栽。¹⁵⁵ 由於當時克爾寄回

¹⁴⁹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6, p. 395, from Kerr to Banks (29 December 1804).

¹⁵⁰ 更精確的說，應是 59 種，其中 58 種是中國植物，1 種是日本植物，見 Robinson, *William Roxburgh*, pp. 230-231 及 Desmond,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Indian Flora*, pp. 67-68.

¹⁵¹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6, p. 395, from Kerr to Banks (29 December 1804).

¹⁵² “Proposed Instructions for William Kerr,” in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p. 483-486.

¹⁵³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中國北方的植物在移植後，比較有可能在英國存活。

¹⁵⁴ 有關潘有度的詳細研究，讀者可先參考：陳國棟，〈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5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3），頁 245-300；後收入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頁 171-223。筆者於此特別感謝陳國棟教授贈予此書。

¹⁵⁵ 班克斯與潘有度兩人在一八〇五到一八〇六年間的書信往來，可見於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p. 49-50, 127-128. 由於潘有度在外商之間的知名度和重要性，所以老李富士也在寫給班克斯的信中特別提到他一八二〇年過世的訊息，見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8, p. 344.

戴麗娟

倫敦的植物經常因不堪海上折騰而半路夭折，班克斯因此曾經建議克爾在當地物色一名有經驗的中國園丁隨船照顧植物到邱園，並且認為這樣的人到邱園生活一陣子可以學習一些實用的園藝知識，一直到下個船季再隨船回中國。班克斯認為可以在潘有度的園丁中找尋這樣的人選，並認為其在歐洲的見聞和所學技術也許返鄉後也能嘉惠其主人。¹⁵⁶

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間擔任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的羅克斯堡在其集大成的著作《印度植物》(*Flora Indica*) 裡數次提到從中國寄來、並在加爾各答植物園栽種成功的植物。其中有些是在他擔任總管前就存在，但許多是在他任內收到，或是由他自己到中國時收集的。貝勒在其名著中整理出羅克斯堡書中所提有關中國引進的植物共有一百多種，可看到一些是由克爾寄送種子而試種成功的，例如南天竹、水松等。在這一百多種在印度可見的中國原生植物中，許多則是由羅克斯堡首次鑑定命名的。¹⁵⁷

一八一二年春天，克爾離開廣州前往可倫坡植物園擔任總管，老李富士變成班克斯主要的中國植物寄送者，但他同時也寄了不少植物到加爾各答植物園，這是一般較為人忽略的一點。幸而一八一五年後擔任植物園總管的瓦立池在其整理的植物清冊中曾經明白感謝老李富士，我們因此可確認老李富士也是這個中、印、英自然史資訊交流網絡的重要一員。¹⁵⁸ 老李富士在華期間採集許多植物、動物標本寄回給英國不同的研究單位，也透過班克斯的介紹，與派駐在英國海外屬地的植物愛好者有所交流。例如在一八一五年一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班克斯就要求在錫蘭任職的詹斯頓 (Alexander Johnston, 1775-1849) 從可倫坡寄檸檬給在廣州的老李富士。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老李富士在給班克斯的信中，提到中國荔枝，還說曾經將荔枝樹種寄到加爾各答試種。但由於班克斯已於當年的六月十九日過世，而人在中國的老李富士尚未得到消息，所以此封信班克斯本人並未收到。

老李富士之外，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節團訪華，隨團醫生阿裨爾 (Clarke Abel, 1780-1826) 也在班克斯的推薦下成為團中負責收集自然史標本的專員，並

¹⁵⁶ Chamber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vol. 7, p. 157, from Banks to Kerr, 6 May 1806.

¹⁵⁷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p. 238-246.

¹⁵⁸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 247.

因此得到東印度公司贊助的設備，得以沿途採集和保存許多中國植物標本。他在華期間受到擔任使團翻譯的馬禮遜許多照顧，長住澳門的李文斯頓也把自己採集的許多廣澳地區的植物贈予他。但阿裨爾此行所採集的標本在一八一七年二月回程中因遭遇海難幾乎全毀，幸而他行前曾經留下一些植物標本給該團副使小斯當東，還有一些岩石標本給海軍軍官兼船長霍爾 (Basil Hall, 1788-1844)，他們遂將標本寄回英國，阿裨爾一路辛苦採集整理的心血才不至於全部付諸流水。¹⁵⁹ 一八二三年，阿美士德被任命為印度總督，阿裨爾也成為其主任外科醫師，隨阿美士德常駐加爾各答。在駐印期間，阿裨爾與在華的英人社群仍保持聯繫，例如李文斯頓在他與胡克的通信中就提到他與阿裨爾一樣都可以幫忙採集標本。¹⁶⁰ 阿裨爾於一八二六年不幸因病過世後，其好友、也是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瓦立池則幫忙照顧其遺孀及家眷，協助他們度過難關。¹⁶¹ 這類中印之間英人社群的私人往來網絡，在東印度公司本身的檔案中未必會有記錄，卻是我們不可忽略的資訊流通管道。

在當時眾多從中國送往印度試種的植物中，茶樹的移植其實是英國人最主要的目標。因為英國在一七八〇年代，飲茶逐漸成為一種風尚，不僅王公貴族、連資產階級、甚至勞工階級也開始養成喝茶的習慣，中國茶葉的需求數量因此激增。¹⁶² 根據老斯當東在其使團報告中提供的數字，十八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在英國公開銷售的茶葉數量大概是五萬磅，到了十八世紀末，也就是使團試圖到中國洽談更好的商貿條件時，這個銷售額已經變成二千萬磅。¹⁶³ 同時由於英國進口到中國的商品在中國乏人問津，英國只得用白銀購買茶葉，向中國輸出的白銀數驚人，因此成為英國政界討論的議題。在加爾各答植物園成立後，班克斯等人因

¹⁵⁹ 見其回國後出版之遊記：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¹⁶⁰ Letter from John Livingstone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24 Dec 1823,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43/13.

¹⁶¹ Letter from Nathaniel Wallich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 Jan 1828,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43/149.

¹⁶² 有關英國飲茶的歷史過程和消費現象已有許多研究，較晚近的可參考 Erika Rappaport, *The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¹⁶³ 轉引自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1, p. 161.

戴麗娟

此極力建議從中國廣州引進茶樹品種到此地試種，希望能在英人可以掌控的地方開始生產本國所需的茶葉。在此想法下，才有前述一七九〇年二月第一批大規模的運送移植。但是從一七九〇到一八三〇年代，經過幾次嘗試，這類移植工作並不成功，原因是大部分經過船運載送到異地的植物存活率都不高，而且不僅運送保存上有困難，因為土壤與氣候條件差異，即使已經移植到加爾各答試種的中國茶葉，其生長也不理想，遑論大量生產。這情況到一八三〇年代中期都還是如此。¹⁶⁴

一八三四年，已知將失去中國貿易壟斷權的東印度公司希望更深入瞭解在印度大量栽培茶樹的可能性，因此在二月成立一個茶葉委員會 (tea committee)，一方面調查印度原生茶葉的品質是否能夠大量產銷，另一方面再次嘗試引進中國優質茶葉到印度試栽。為此，該委員會派出秘書戈登 (George James Gordon) 到福建武夷山區深入瞭解茶樹種植狀況及採集標本。戈登此行聘請能操持中文、且已到過當地的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擔任嚮導，最後也帶回近八萬個茶樹種子，分別種在加爾各答、阿薩姆、馬德拉斯、穆索里等地，但這次試種的結果仍然令人失望。¹⁶⁵

植株運送的存活率要等到瓦德箱 (Wardian case) 出現後才有明顯的改善。瓦德箱於一八二〇年代末期間世，並於一八三〇年代中期開始普及，由於是玻璃製的小型溫室，在底部附有培養土，這樣的運送箱在船運中可以讓植物接收到陽光、保持濕潤，但同時不受含鹽海水及海風影響，使得植物長途運送存活率大幅度提升，這樣的技術改良也改寫了植物移植的歷史。¹⁶⁶

一八四〇年代末，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委託、經過倫敦皇家園藝學會挑選所派遣的植物獵人福鈞深入到中國內地採掘，便大量利用瓦德箱，成功地將數千優良的中國茶樹苗引進印度，先安頓在加爾各答植物園，之後引進中國籍製茶人指導，並由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法康諾再移轉到氣候與土壤較適合的阿薩姆和大吉

¹⁶⁴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75), p. 205.

¹⁶⁵ George Van Driem, *The Tale of Tea: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e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pp. 625-627.

¹⁶⁶ Lucile H. Brockway,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5-86.

嶺等地來栽培，最後發展成大面積的茶園。印度英僑後續還引進機器來加速製茶過程，使得印度在一八八〇年代變成全球知名的茶葉產地，甚至可以取代中國茶葉在全球市場的地位，也讓英國得以完全脫離倚賴中國茶葉進口的局面。¹⁶⁷ 這樣改變中英之間茶葉貿易關係的歷史情節之所以可能，其源頭正必須回溯到一七九〇年代，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已經嘗試與在中國廣州與澳門的英人社群之間建立起寄送植物的管道，雖然前後經過多次移植失敗，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成功，但是對茶葉移植知識的摸索，一直在英、印、中的英人社群中流通、累積。加上一八二〇、三〇年代，不同緯度殖民地的擴張，使得在加爾各答植物園種不成功的茶株得以移植到氣候條件更適合的阿薩姆和大吉嶺試種，¹⁶⁸ 終於促成茶葉在印度大規模栽種，並使印度生產之茶葉最後得以取代中國茶葉。

若細究福鈞到中國數次採集實用植物的淵源，也就是他在一八四三年初次被派遣的過程，以及他在香港、上海所得到的在地後勤支援，可以發現與本文主題澳門博物館有關的英僑扮演了關鍵角色。利用五口通商開放之便，派遣一位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植物獵人到中國內地尋找當地植物並帶回英國栽種，這樣的想法首先是由倫敦園藝學會內的中國委員會提出，而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份子就包括前述的老李富士、知名的洛迪吉園藝公司負責人的喬治·洛迪吉 (George Loddiges, 1786-1846)，以及當時擔任園藝學會秘書的林德利 (John Lindley, 1799-1865) 三人。¹⁶⁹ 老李富士對中國植物的認識眾所公認，他退休回英後仍繼續在此領域著力。洛迪吉園藝公司專門從事園藝植物栽培與銷售，也大量引進異國植物到英國，洛迪吉父子對中國植物早有興趣，曾經在一八二〇年寄信給馬禮遜，請求後者協助收集和寄送中國植物種子給他們。¹⁷⁰ 林德利當時除了是園藝學會秘書，也在倫敦大學教授植物學，他是蘭花與玫瑰研究的專家，自然對中、日的園藝植物感到興趣。十九世紀中葉李善蘭等人譯寫成《植物學》一書，被視為是中國引進西方近代植物學的首部翻譯著作，其所依據的材料正是林德利的作品。

在被這個中國委員會委任前往中國前，福鈞原是園藝學會在奇西 (Chiswick) 植物園的管理人。在他第一次出發前，曾經擔任澳門博物館秘書，但當時已經變

¹⁶⁷ 有關福鈞的這段故事，可見莎拉·羅絲，《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

¹⁶⁸ 英國取得阿薩姆是在一八二六年，取得大吉嶺是在一八三五年。

¹⁶⁹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217.

¹⁷⁰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77.

戴麗娟

成顛地公司生意夥伴的小李富士正好休假返英，他不僅提供經濟上的資助，並且安排福鈞在香港和上海的住宿。¹⁷¹ 福鈞在一八四四年還借到當時已經過世的托瑪斯·比爾過去請人將其花園內的中國內地植物繪成的畫，以協助辨識自己要採集的目標。¹⁷² 他在一八四八年被東印度公司委託再赴中國以茶株為採集目標時，以上海為據點，就受到已經移居上海的小比爾的協助，將已收集但還未上船送到印度的植物都暫時種在小比爾上海住家的花園。¹⁷³ 小比爾也為其提供可信賴的買辦，為他打點旅程所需的僕人及物資等。¹⁷⁴ 可見曾經參與澳門博物館活動的英人社群在離開澳門後，仍在不同時機點參與了英、印、中之間的自然史資訊與物質的流通網絡運作，他們的廣、澳經驗實是不可忽視的背景。

參·結語

由此研究可以看出，澳門英人社群在一八二九年初所設置的小型博物館，其成立背景多少是受到英人在加爾各答、倫敦等地相繼成立的亞洲學會組織之啟發，加上有長期中國經驗的馬禮遜、小斯當東等人的推動，而其實際運作上有賴一群業餘的自然史愛好者來經營。若我們只強調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而不去理解印度模式對當時在華英人社群可能產生的影響，那我們可能無法理解為何這群寓居廣澳的英人會在當時嘗試成立一個博物館。同樣地，有關自然史標本的寄送，若我們只強調在華英人將標本寄回英國這點，而忽略了他們與當時印度、麻六甲、新加坡等地的交流，我們就可能完全忽略這個個案遺留的文獻所透露的層層歷史意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文比既有研究更進一步指出以下三點。首先是馬禮遜作為博物館成立的推手角色，以及在這方面加爾各答亞洲學會模式、麻六甲英華書院等既有經驗所扮演的靈感來源。現有的馬禮遜研究已指出他翻譯聖經、編撰英漢雙語字典、引進印刷術、成立學校等貢獻，至於馬禮遜與亞洲學會的關係，以及他對博物館物件的使用等課題，也許是未來還可進一步探討的面向。

¹⁷¹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219.

¹⁷²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228.

¹⁷³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p. 240.

¹⁷⁴ 莎拉·羅絲，《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頁 66。

本文第二個重點，亦即廣、澳英人社群與加爾各答植物園之間的植物寄送和自然史資訊交流，也擴大了國際學界既有的認識。事實上，有關植物園在大英帝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對自然資源的掌握與治理，以及對殖民擴張可能有的幫助，相關的研究不少，有研究也已指出加爾各答、好望角、聖海倫娜島、倫敦邱園、聖文森島這條英帝國運輸植物的經常性路線。¹⁷⁵ 但這些研究並未注意到澳門、廣州與加爾各答植物園之間的植物交流，所以也未留意中國原產植物曾經透過這條路線所涉及的植物園網絡而流傳到世界各處。事實上，如文中所示，當時也存在以加爾各答植物園為中心，而未必通過倫敦所到達的不同網絡。尤其是在一八二〇年班克斯過世後，倫敦邱園歷經將近二十年蕭條期，而加爾各答植物園在蒐集及栽培亞洲植物方面曾經扮演積極活躍的角色。這些都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本文的第三個重點，也是此結語部分重心所在，是要探討這個澳門博物館在中國的後續效應。儘管這個博物館存在的時間極短，但這樣的經驗對後世並非全無影響。例如英人在一八四二年取得香港後，一八四五年就在當地成立一個學會，¹⁷⁶ 此學會並在一八四七年正式成為皇家亞洲學會在香港的支會，當時稱中國支會。此時正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1844-1848 年任此職）任內，他也是香港這個支會的第一任會長。德庇時的中國經驗正是建立在廣州貿易時期。他的父親（Samuel Davis, 1760-1819）已是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他本身則是在一八一三年十八歲時就到廣州商館工作，從基層書記做起，一八二七年進入特選委員會，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貿易上失去特許權時，他正好是特選委員會的主席，算是末代大班。在律勞卑被英政府派來擔任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時，德庇時擔任副總監（Second Superintendent），當時健康情況已不佳的馬禮遜則擔任漢務參贊（Chinese Secretary）。馬禮遜於該年八月一日於廣州過世，律勞卑不久也在澳門撒手人寰，此時德庇時奉命擔任總監。但由於他不願對中國採取強硬的要求，這讓心急於建立完全自由貿易的港腳商人頻頻抱怨，促使他於一八三五年初即辭職離華返英。¹⁷⁷

¹⁷⁵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p. 121.

¹⁷⁶ 原本名稱是 China Medico-Chirurgical Society，零星的成員與其他新成員將之改為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China，復又改稱 Asiatic Society of China，並申請加入倫敦的亞洲學會。見“Journal of Proceedings,”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847): 71-76.

¹⁷⁷ 有關其生平，可參考：George Beer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29。

戴麗娟

由於前後在廣州澳門居住二十多年，德庇時對英人在當地的生活相當熟悉。他與大部分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不同的是，他到中國後就非常積極學習中文，而且不是為了應付公司的要求而已，還利用公餘時間投入文學翻譯工作，以增進自己的中文能力。他在這方面的表現受到小斯當東和馬禮遜的肯定，因此曾被指派和馬禮遜一起擔任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團的四位中文翻譯之一。此使團任務雖以失敗告終，但德庇時並未放棄翻譯工作，一直到他離開廣州為止，其翻譯的作品數量之多，可說是在傳教士之外，當時最積極投入中英翻譯的一位。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在一八二八年成立東方語言翻譯委員會 (Orient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以及相關基金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德庇時便是委員之一，並且在其下出版多部翻譯作品。他原本就是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的創始會員之一，在一八三五年返英後，與小斯當東持續保持聯繫，也是在後者的薦舉之下，得以順利取得爵位，並赴港擔任總督。¹⁷⁸

他在香港學會成立的致詞中就指出，在眾多會員可以投入的研究領域中，調查當地動植物、地質等自然科學是最有發展潛力的。¹⁷⁹ 他認為學會應該成立一個博物館，一方面可將這些標本收集匯整於一處，以利研究，另一方面可持續保存那些有可能被破壞而不再存在的生物標本。香港這個新設的學會的確在一開始的章程內就設置了一名管理人 (curator)，負責整理和保存博物館標本，但同時也要負責管理圖書室藏書，供會員借閱。¹⁸⁰ 在其致詞中，德庇時也提到希望以他總督之力，撥一塊地，在當地建設一個植物園，作為歐洲植物引進中國時的存放地點，也是要將當地植物送往英國時的集中站。只是此事因為經費不足、地點未定，遲至一八六四年才實現。¹⁸¹ 香港這個亞洲學會支會則運行到一八五九年就停止，直到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才重新恢復活動。¹⁸²

¹⁷⁸ 見斯當東，《小斯當東回憶錄》，頁 87-89, 93。德庇時在港督任內，因希望達到殖民地自給自足的目標，制訂各種徵稅政策而不受當地英僑歡迎，故任期不長。

¹⁷⁹ 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支會的會報第一期：“Preliminary Address,”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847): v-xxi, 尤其是 p. xi。

¹⁸⁰ “Law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847): 74.

¹⁸¹ “Preliminary Address,” pp. xiv-xvi。有關香港植物園之沿革，還可參考：D. A. Griffiths and S. P. Lau,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A Historical Overview,”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 (1986): 55-77。

¹⁸² 見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history>，讀取 2019.01.21。

在香港之後，上海的英美人社群也於一八五七年成立了一個學會，並在次年正式成為皇家亞洲學會的支會，但因為當時「中國支會」的名稱已被香港所用，這個上海的支會便取名為「北中國支會」(North China Branch)。此次則是由一八三〇年就中國廣州定居的美籍傳教士裨治文為首發起，成立之初的許多會員，包括裨治文本本人，其實已經是香港支會的通訊會員。裨治文到中國傳教的因緣完全是由馬禮遜而起，他在中國初期的生活也完全受到馬禮遜的協助，他的廣州經驗對他後來在中國的發展有至要的影響。¹⁸³ 馬禮遜於一八三四年夏天因病過世後，裨治文等人立即推動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並在一八三九年成功促成馬禮遜紀念學校在澳門開辦（一八四二年底遷往香港）。除此之外，在傳教、翻譯、辦報、出版、漢學研究等方面，裨治文等傳教士持續發揚馬禮遜在澳門和麻六甲奠下的基礎。¹⁸⁴ 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海這個亞洲學會在某個程度上也可算是新教傳教士在廣、澳所推動的文化事業之延續。學會在建立初期也規劃建置圖書館與博物館，一八七一年學會有了專屬的建築物後，圖書館隨即成立，博物館則於一八七四年開始運行，並持續到二十世紀中葉才永久關閉。¹⁸⁵

由後來香港、上海的發展回頭來看澳門博物館的案例，可看出這可能是當時在印度加爾各答、英國倫敦形成的亞洲學會附屬博物館模式在中國的初次嘗試，雖然規模不大、活動時間不長，最後也遭人遺忘，但是其經驗顯示類似組織型態是有可能在中國地區實現的，這也是為何從廣州、澳門移居到香港、上海的英美人社群會再次嘗試，而終於開花結果。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二月十二日收稿；同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¹⁸³ 有關其生平，可參考：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 著，尹文涓譯，《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¹⁸⁴ 李志剛，《馬禮遜牧師傳教事業在香港的延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7）。

¹⁸⁵ 見戴麗娟，〈展示自然〉。

戴麗娟

後記

此研究最初成果是在二〇一八年四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舉辦之「東亞、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國際城市與跨國網絡國際研討會」報告，其後陸續修訂的版本也曾在加拿大拉瓦爾大學 Université Laval 文學院主辦之國際會議、臺灣世界史討論會、中研院史語所講論會、政大歷史系、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等場合發表，筆者十分感謝主辦者的邀請和與會聽眾的提問。文章送審後，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的意見皆讓我受益有加。文章定稿前又蒙蘇精老師撥冗費心指正，筆者感激不盡。此外，林韻丰、侯家榆兩位助理長期協助這個主題的工作，容我在此一併申謝。

附錄

皇家亞洲學會暨支會一覽表（依起始年先後順序排列）

下表支會名稱中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 “RAS” 縮寫。

名稱 (定名)	地點	起始 年代	結束 年代	加入 年分	組織 / 名稱異動
The Asiatic Society 亞洲學會	Calcutta 加爾各答	1784	仍存	1829	創始名稱 The Asiatic Society 1935-50 年曾更名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The Asiatic Society of Mumbai 孟買亞洲學會	Bombay (Mumbai) 孟買	1804	仍存	1829	創始名稱 The Bombay Literary Society 改名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9-1954) 改名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ombay (1955-2002) 2002 年改為現名
The Madras Literary Society 馬德拉斯文學學會	Madras (Chennai) 清奈	1812	1894	1830	1866-1877、1882-1885 年兩度中斷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皇家亞洲學會	London 倫敦	1823	仍存	無	1829 年後被視為總會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AS 香港支會	Honk Kong 香港	1845	1859 (1960 復興)	1847	
The Sri Lanka Branch of RAS 斯里蘭卡支會	Colombo 可倫坡	1845	仍存	1846	創始名稱 The Asiatic Society of Ceylon

戴麗娟

名稱 (定名)	地點	起始 年代	結束 年代	加入 年分	組織 / 名稱異動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AS 北中國支會	Shanghai 上海	1857	1952	1858	創始名稱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日本亞洲學會	Yokohama/ Tokyo 橫濱 / 東京	1872	仍存	1936	1940-1948 年中斷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RAS 馬來西亞支會	Singapore 新加坡 (1877-1964) Kuala Lumpur 吉隆坡 (1964 至今)	1877	仍存	1878	創始名稱 The Straits Asiatic Society 1923 年曾改名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4 年改為現名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北京東方學會	Peking 北京	1885	1911	1888	創始名稱 The Peking Literary Society
The Korean Branch of RAS 朝鮮支會	Seoul 首爾	1900	仍存	1900	1941-1945、1950-1953 年兩 度中斷
The Mythic Society of Bangalore 班加羅爾 神祕學會	Bangalore 班加羅爾	1909	仍存	1924	

名稱 (定名)	地點	起始 年代	結束 年代	加入 年分	組織 / 名稱異動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緬甸研究學會	Rangoon 仰光	1910	1980	1924	
The McGill University Oriental Society 麥基爾大學 東方學會	Montréal 蒙特婁	1911	1916	1912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畢哈研究學會	Bankipur 班吉布爾	1915	1989 (?)	1924	創始名稱 The Bihar and Orissa Society 1943 年改為現名

資料來源：Stuart Simmonds and Simon Digby eds.,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Leiden and London: E.J. Brill, 1979); Frederick Eden Pargiter, ed., *Centenary Volume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1923*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172_2009-10-30.html，讀取 2019.01.21;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history/>，讀取 2019.01.21; <http://www.raskb.com/content/about-us>，讀取 2019.01.21; <http://hompi.sogang.ac.kr/anthony/RASKBHistory1940.html>，讀取 2019.01.21; <http://igpweb.igpublish.com/igp/journal-of-the-burma-research-society-jbrs-ejournal>，讀取 2019.01.21;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0521669>，讀取 2019.01.2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組織中國博物館協會緣起〉，《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1.1 (1935)：1-2。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8冊。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博物館一覽》，北平：中國博物館協會事務所，1936。
李文馥，〈登洋人博物樓〉，《粵行吟草》，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13冊，頁74。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米憐 (William Milne) 主編，《印中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18-182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重印本。
斯當東著，屈文生譯，《小斯當東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Actual State of Macao.” *The Canton Miscellany* 5 (1831): 381.
“British Museum in China.” *Canton Register* 1829.03.02.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Alphabetical List of Persons; List of Commercial Houses and Agents; to which are Added a List of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the Names of Foreign Consuls, and of the Hong Merchants and Linguist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5.9 (1837): 426-432.
“Historical Landmarks of Macao.”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 (1887): 385-394.
“Journal of Proceedings.”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847): 71-76.
“Life in Macao in the 1840’s, 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s. Rebecca Kinsman Munroe.”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86 (1950): 25-26.
“List of Donations to the Library of the Asiatick Society, since 1810.”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Instituted in Bengal,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2 (1816): xi.
“Member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Instituted in Bengal,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0 (1808).

- “Museum at Macao.”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 28 (1829): 370.
- “Preliminary Address,”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847): v-xxi.
-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Wednesday Evening, the 4th May, 1836.”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5.52 (1836): 245-254.
-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Names of the Trustees and Members, with Remarks Explanatory of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5.8 (1836): 373-381.
- Abel, Clark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1.
- Bennett, George. *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Batavia, Pedir Coast, Singapore, and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in Those Countries, During 1832, 1833, and 1834*. 2 vols. London: R. Bentley, 1834.
- Bretschneider, Emil V.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2 vol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 1898. Reprint,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td.; Tokyo: Edition Synapse, 2002.
- Chambers, Neil,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1768-1820*.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2014.
- Dawson Turner Copies, Joseph Banks Correspondence, Department of Botan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ndon, vol. 7, f. 64, List of plants brought from China, 12 February 1790.
- Fortune, Robert.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52.
- Griffiths, D. A., and S. P. Lau.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A Historical Overview.”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 (1986): 55-77.
- Hillard, Katharine, ed. *My Mother’s Journal: A Young Lady’s Diary of Five Years Spent in Manila, Macao,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from 1829-1834*. Boston: George H. Ellis, 1900.
- Hodges, Nan P.,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2 vols.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

戴麗娟

- Hooker, William J. "Some Account of the Substance Common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Rice Paper." *Botanical Miscellany* 1 (1830): 88-91.
- Jones, William. "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Asiatick Researches* 1 (1788): ix-xvi.
- Letter from Charles Millett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3 Apr 1830.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52/20.
- Letter from John Livingstone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24 Dec 1823.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43/13.
- Letter from Nathaniel Wallich to 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 Jan 1828.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Archives: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43/149.
- Livingston, John. "Treatment of Certain Diseases by Chinese Doctors." *Indo-Chinese Gleaner* 15 (1821): 5-8.
- 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Boston: J. Munroe, 1836.
- Mitra, Rājendralāl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In *Centenary Review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rom 1784 to 1883*. Calcutta: Thacker, Spink and Co., 1885, pp. 1-195.
- Morrison, Eliza 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 vols.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 Morrison, Robert.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3.
- Pargiter, Frederick Eden, ed. *Centenary Volume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1923*.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 Staunton, George Leonard.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G. Nicol, 1797.
- Stifler, Susan Reed.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46-82.
- Trustees of the Indian Museum. *The Indian Museum, 1814-1914*.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14.

二 · 近人論著

中國博物館學會編

2005 《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方漢奇主編
1992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何偉傑
2010 〈作為史料的專欄文字：以金豐居士所撰的風水掌故為例〉，《澳門歷史研究》9：205-207。
-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
2009 《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全6卷。
-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
1999 《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
- 李志剛
2007 《馬禮遜牧師傳教事業在香港的延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 李鵬翥
1993 《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
- 李麗青
2015 〈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澳門研究》4：160-166。
- 林玉鳳
2015 《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 金豐居士
2008 〈寶血修院鳳尾坡吉穴難得清貴〉，《新報》2008.05.15。
- 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著，姚京明譯
1998 《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
- 梁容若
1932 〈濟南廣智院調查記〉，《山東民眾教育月刊》3.3：71-85。
- 莊秋君
2015 〈十九世紀越南華裔使節對中國的書寫——以越南燕行錄為主要考察對象〉，《漢學研究集刊》20：113-136。
- 莎拉·羅絲 (Sarah Rose) 著，呂奕欣譯
2014 《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臺北：麥田。
- 郭永亮
1990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戴麗娟

陳益源

2011 〈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陳益源著，張伯偉主編，《越南漢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頁 225-236。

2016 〈在閩南與越南之間——以越南使節李文馥家族為例〉，《應華學報》17：1-16。

陳國棟

1993 〈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5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頁 245-300。

2014 《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游博清

2017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786-1816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臺北：元華文創。

游博清、黃一農

2010 〈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9：1-40。

湯開建

2016 《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上、下卷。

程美寶

2009 〈班克斯爵士與中國〉，《近代史研究》4：146-152。

黃炎培

1915 〈山東廣智院（考察教育所見之二）〉，《教育研究》（上海）19：7-16。

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 著，尹文涓譯

2008 《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潘劍芬

2017 《廣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1714-1911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戴麗娟

2013 〈從徐家匯博物館到震旦博物館——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3：329-385。

2019 〈展示自然：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動（1874-1952）〉，《法國漢學》18：72-116。

薛鳳旋編著

- 2012 《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香港：三聯書店。

譚樹林

- 2010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蘇精

- 2005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2010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西醫來華〉，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4-76。
- 2014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Beckingham, C. F.

- 1979 “A Histo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3-1973.” I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edited by Stuart Simmonds and Simon Digby. Leiden: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E. J. Brill, pp. 1-77.

Brockway, Lucile H.

- 2002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x, Euan H. M.

- 1945 *Plant-Hunting in China: A History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and the Tibetan Marche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ranmer-Byng, J. L., ed.

- 1962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Dasgupta, Subrata

- 2007 *The Bengal Renaissance: Identity and Creativity from Rammohun Roy to Ra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De, Amalendu

- 2003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iatic Society (1766-1835)*. Kolkata: Asiatic Society.

戴麗娟

Desmond, Ray

1992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Indian Flora*.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2007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Lond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Drayton, Richard Harry

2000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riem, George Van

2019 *The Tale of Tea: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e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Ehrman, Edwina, ed.

2018 *Fashioned from Nature*. London: V&A Publishing.

Endacott, George Beer

2005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an, Fa-ti

2004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rquhar, William, et al.

2010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The Complete William Farquhar Collection: Malay Peninsula, 1803-1818*.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Fay, Peter Ward

1975 *The Opium War, 1840-18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enoways, Hugh H., and Mary Anne Andrei, eds.

2008 *Museum Origins*.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Gladwyn, Derek

1992 *Leigh Park: A 19th Century Pleasure Ground*. West Sussex: Middleton Press.

Greenberg, Michael

1951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ove, Richard H.

1995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Alfred Rupert
1969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A History, 1819-1969*.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 Harrison, Brian
1979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erbert, Eugenia W.
2011 *Flora's Empi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ummel, Arthur W.
1945 "The Journal of Harriet Low."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tions* 2.3/4: 45-60.
- Kilpatrick, Jane
2007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td.
- Kopf, David
1969 *British Orientalism and the Bengal Renaissance: The Dynamics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1773-183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a, Paul
2018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 1818-1843: Its Location and Faciliti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1.1: 69-88.
- Lamas, Rosmarie Wank-Nolasco
2006 *Everything in Style: Harriett Low's Maca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 Pichon, Alain, ed.
2006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m, Patricia
2011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oines, Elma, ed.
1953 *The China Trade Post-Bag of the Seth Low Family of Salem and New York, 1829-1873*. Manchester, ME: Falmouth Publishing House.

戴麗娟

Magee, Judith

2011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Malcolm, Elizabeth L.

197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7.2: 165-178.

McCracken, Donal P.

1997 *Gardens of Empire: Botan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Victorian British Empire*. London and Washingt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Nierstrasz, Chris

2015 *Rivalry for Trade in Tea and Textiles: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 (1700-180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O’Sullivan, R. L.

1988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the Early ‘Singapore I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2: 45-62.

Puga, Rogério Miguel

2012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3/4: 575-586.

Rappaport, Erika

2017 *The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de, Lindsay, May Ride, and Bernard Mellor

1996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Tim

2008 *William Roxburgh: The Founding Father of Indian Botany*. Chichester: Phillimore & Co. Ltd.

Sen, Amit

1946 *Notes on the Bengal Renaissance*.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omas, Adrian P.

2006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Plant Transfer, Science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6-180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2: 165-177.

- Thompson, John M. A., ed.
1992 *Manua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Oxford and 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 Van Dyke, Paul A.
2005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Watt, Alistair
2017 *Robert Fortune: A Plant Hunter in the Orient*. Kew, Surrey: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 Whitehead, Peter James Palmer, and Kenneth Alan Joysey
1967 “The Vachell Collection of Chinese Fishes in Cambridge.” *The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Zoological Series* 15.3: 121-165.
- Whitehead, Peter James Palmer, and Phyllis Irene Edwards
1974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Selected from the Reeves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三 · 網路資訊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172_2009-10-30.html，讀取 2019.01.21。
- <http://homp1.sogang.ac.kr/anthony/RASKBHistory1940.html>，讀取 2019.01.21。
- <http://igpweb.igpublish.com/igp/journal-of-the-burma-research-society-jbrs-ejournal>，讀取 2019.01.21。
- <http://www.raskb.com/content/about-us>，讀取 2019.01.21。
-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0521669>，讀取 2019.01.21。
- Adam Matthew, Marlborough, East India Company
<http://www.eastindiacompany.amdigital.co.uk>，讀取 2019.01.30。
-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history>，讀取 2019.01.21。

戴麗娟

A British Museu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acau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atural History Information Network Flows among Britain, India, and China

Li-Chuan T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expatriates living in Canton and Macau established a small museum in Macau. Having existed for only five years from 1829 to 1834, the museum was all but forgotten until rec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tudies revived interest in the institu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fully explain why this museum emerged then and there, nor does it examine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broader implications. Relying on fragments of evidence from news articles, diaries, travelogues, and written correspondence at the tim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eople, circumstances, times, places, and material objects related to the museum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ase and reveal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is structur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museum's origins, location, and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its founding and operations.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larger context, including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 of exchanges among them. Because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and its affiliated museum were the primary models for this British museum in Macau, understanding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twork that was gradually forming at the time can help to clarify the museum's historical context. Moreover,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natural history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flows among Britain, India, and China, since India's involvement in this network has been particularly neglected in earlier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constituted one of the hubs within this plant and seed exchange network, in which people related to this British museum in Macau participated. By sorting through natural history exchanges among relevant individuals then living in Canton, Macau, Calcutta, and London, this article restores this museum to its proper place in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node in several global network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Macau was too small to establish a local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s they had intended. However, as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atriates moved to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 later years, their experiences in Macau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imilar societies. In light of those activiti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is British museum in Macau, despite its short-lived existence, had a lasting historical legacy.

Keywords: British community in Macau, British museum in Macau, Asiatic Society,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natural history